

## 研究論文

# 方塘鑑開：大學校湖水景的政治與文化

楊凱傑\*、陳彥傑\*\*

## 摘要

本研究是以台灣大專校院的人工湖泊（校湖）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政治與文化層面。相較於一般水利設施，校湖以明顯可見、著重美學的特性脫穎而出。本文將焦點置於校湖的政治與文化意涵，運用人造物的政治和基礎設施研究的詩學之取向，分析校湖在規劃者與使用者之間「權力」和「權利」的動態關係，以及其在地方社會生產和建構中的角色。通過五座具代表性的校湖場域的實地考察，本文描繪了校湖的現象輪廓，深入探討其領域變化、邊界游移與消長的過程，同時闡述其在地方感創造中的形象與再現意涵。最終，本文強調校湖的政治與文化面不僅是觀點的一體兩面，同時也是其運行與依存之基底，具有物質性和社會性的支持功能。透過此研究框架，期望提供讀者對校湖的分析性視角，突顯研究題材的潛力與未解之謎。

**關鍵詞：**校湖、基礎設施、領域、地方、校園規劃

---

收稿日期：2024 年 01 月 08 日；修訂日期：2024 年 04 月 06 日；接受日期：2024 年 06 月 07 日。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通訊作者）。email: jay70707@nyc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email: yjchen9508@gmail.com

## 一、前言

伴隨極端氣候致使洪旱頻率之增加，水資源的管理與調適備受重視，相關之水利設施乃至爭議隨之而來，並成為爭論的課題。反映於學界，其主要開展於政策民主化與科學民主化二類研究視角，端視這項工程物捲入之治理、決策、開發等過程，以及不同專業知識、區域尺度、部門等跨域之協商關係（黃書緯，2022）。從基礎設施研究的視角，相關水利設施的爭議經常發軔於自身的脆弱性。意即設施需仰賴其餘設施的配合及持續性的維護方能運作外，以及其作為民生的支持出現失靈與不彰時，頃刻便能讓民眾的日常生活陷入癱瘓與不安，從而令人們意識其存在與對其高度仰賴。這同時也意味了基礎設施平時那隱匿不顯或宛若背景之特質（Kaika, 2005；王志弘、黃若慈，2018；李蔚、王志弘，2021）。

弔詭的是，這種隱匿不顯的特性卻不見於大學校園的人工湖與水池。相反地，這類的水利設施反而公開且大方迎人，有的還是校內著名景點、亮眼景觀，如國立臺灣大學醉月湖、國立清華大學成功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竹湖等皆然。據本研究盤點，放諸全國 158 所大專校院，此類的人工湖設施至少有 87 座（呈圖 1）；而設有人工湖的學校，其官方校園地圖約九成標示人工湖與水池之位置。此番現象令人聯想到 Kaika（2005）對於供水管線的觀察，即縱使是看似隱密的都市供水設施，也不全然每個環節皆如此隱匿。像是水塔、幫浦等設施既裸露在外，甚至還成為都會地景中的都市嫁妝（urban dowry），體現其都市的現代與進步表徵。倘若高度隱匿的管線設施如此，遑論校園的人工水湖——既是蓄洪用的水利設施，亦為點綴校園景觀之水景存在。

惟目前的研究裡，儘管可見校園人工湖的研究，卻主要聚焦於其水質、水資源利用、水岸環境設計等面向（王聖允，2012；江信佑，2007；張源修等，2010），並傾向視之為滯洪池、生態池等具功能性設施。還有部分研究係採實證研究取向，探討人與湖之間的地方連結關聯程度，或論其作為文化與生態資產之價值等（袁美華等，2016；周紓帆等，2014），強調其蘊含之場所特性。儘管文獻多意識校湖作為一兼具蓄洪、生態等用途之設施物，然既無探討到前述水利基礎研究中的隱匿特質，也鮮少論及其作為支持日常運作之基礎所引發之爭議，乃至捲入之社會、政治、文化等層面的審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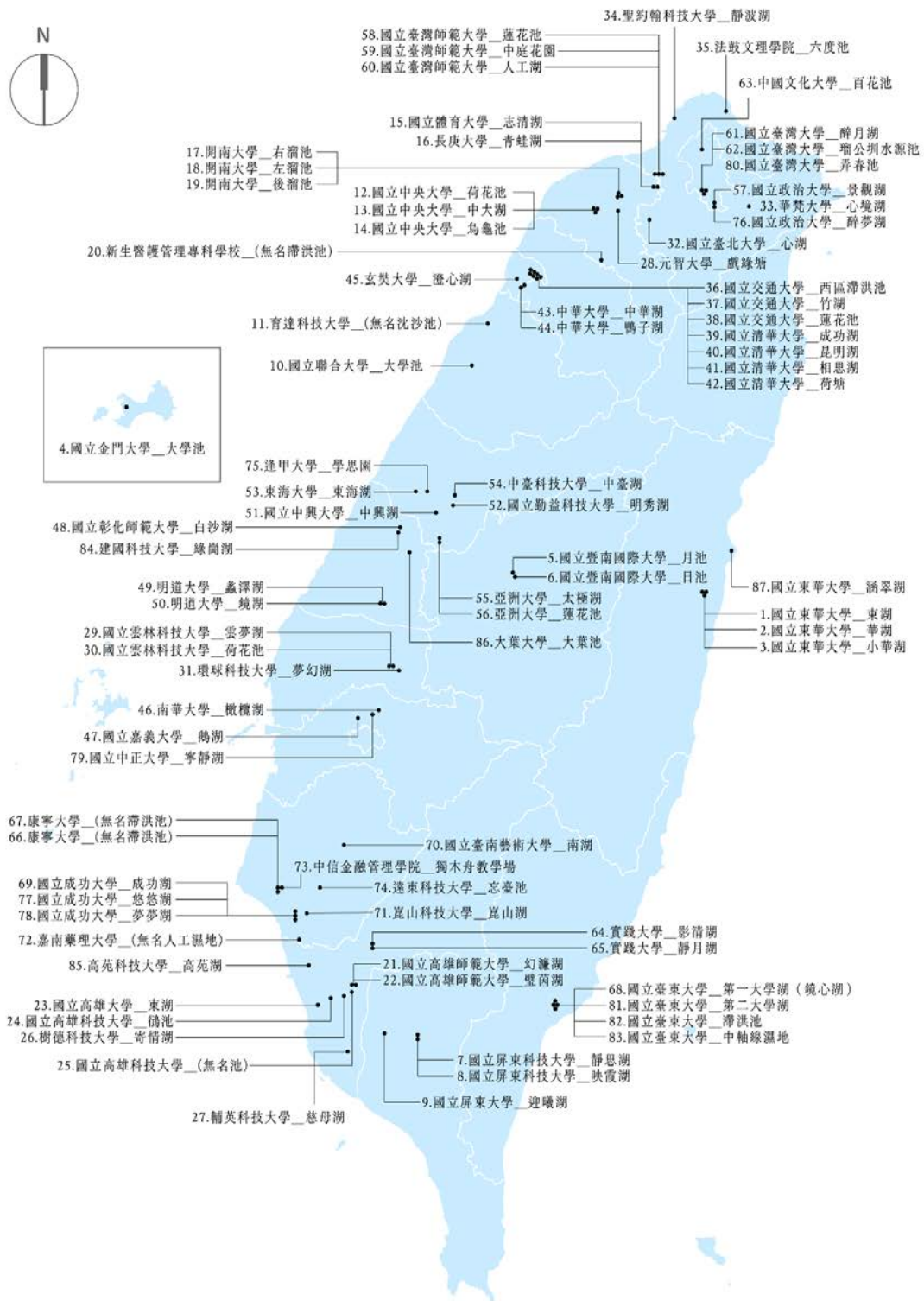


圖 1 全台大專院校校園湖泊與水池之分佈 (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此外，上述文獻皆以個案湖岸作為考察對象，仍缺乏對於各個湖之間的橫向比較乃至全盤性、綜合性之理解——縱使已有報章、社群媒體等留意校湖並非單一校園獨有景觀設施。相關現象全面性的討論至早可回溯 2014 年一名曰「菊湖傳說」臉書粉絲專頁，其就全台設有湖泊大專校院做初步的盤點。楊凱傑、陳彥傑（2023）則進一步盤點了全台校湖數目、位址、形制等，並指陳校湖已成為眾大學校園的景觀標配；部份者甚至有專屬之湖名、發展歷史及從中而生之獨特文化，有的湖泊之建成還是受到它校案例啟發而生（如台大醉月湖因清大成功湖而生），從而不單是校園的附屬景觀。這也意味了校湖非罕見、全國普遍的現象，尚有歷史與文化脈絡上的關聯，因而得以跳脫單一校園景觀的空間尺度，獨立為一現象主體與主題來審視。

立足於上述認識論立場，即以更為寬泛的地理尺度且不限於技術與功能層次，本研究進一步地透過基礎設施研究的視角，檢視楊凱傑、陳彥傑（2023）列舉之校湖案例以及其特徵。本文發現校湖既普遍為蓄洪池一類之水利基礎設施，有的尚是兼具景觀與生態功能之綠色基盤，甚至係師生、市民前往並用以遊憩、育樂之開放空間，即社會學家 Klinenberg（2021）指稱之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般存在。若納入政治和文化層面的審視，校湖還關涉於其受誰決定，何人可以近用（access），如何命名、規劃、決策等過程，或是反映特定意識形態；以及，校湖亦牽涉了水域景觀的設計美學考慮、感官體驗效果、場所詮釋等層面。

順此，若說基礎設施（或謂「關鍵基礎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意指那些別種工作的「部分背景」與社會正常運轉不可或缺之「暗中支持」；以及，社會性基礎設施是令「社會資本得以發展的『實體條件』」（Klinenberg, 2021: 10）。那麼在校湖例子裡，其亦然也可探問那些支持與承載政治與文化意涵之實體條件具體為何。若以提問形式來表示，本文有意反詰道：校湖除了是蓄洪池一類關鍵基礎設施，它還可以是什麼？而以上臚列之基礎設施的各個層面，不啻為本研究進一步探索之具體指引。另外，順著基礎設施一題，前文對於水利基礎設施物之隱匿性探討，亦提醒本文關注與思索校湖那悖反基礎設施通常情形之「通透」特性——無論指向外顯的形制或作為提喻、象徵的層次，何以與管線等水利設施迥異——從而為本文有待梳理之工作。

## 二、人造水景的技術物與規劃考論

### (一) 景觀水體、公園類比到視覺批判

綜觀全台大專校院校湖(呈圖 1)，可以發現命名的單位並不一致，像是有的名曰「湖」，有的取名為「池」，亦有的以「塘」或「園」來稱呼(楊凱傑、陳彥傑，2023)。就景觀學的角度，此類的校園水體意指室外止水。依其容器的特性與形狀，又可細分為「池」和「塘」二類。池指的是人造容器內的水體，池緣的線條堅硬分明，外型以幾何形狀為主；塘則為自然或半自然之水體，主要由泥土、自然元素所構成，且造型呈不規則狀。除了取決於人造的程度、組成與形狀，兩種止水的差異尚反映於規模(塘大於池)、適宜區位(池應在都市，塘置於鄉村或都市公園內)，以及視覺感受(塘比池還來得柔順而寧靜)等面向(侯錦雄、李素馨，2003: 226-9)。

若按此則分類，校湖雖然規模無固定，不過其建成的用意旨在帶予個人愜意、悠閒的感受，並營造接近自然景觀之效果；類型上接近於塘的定義。例如，交大的竹湖即是利用既有的地窪地勢改造而成，並於四周種植竹林；<sup>1</sup>以及，竹湖也令周邊的教學區域(人社一館、人社二館、管理一館、校門口等)得以產生統一聯繫感，令其所處校區視覺上和諧，組合成一體；又者，湖畔一帶建造環湖步道，套借侯錦雄、李素馨(2003)說法，旨在透過引導他人行經一連串空間，引發其欲以尋訪景物之探索旨趣(頁 229)。其他類似形制者尚有清大的成功湖、台大的醉月湖等。當然，本文也發現不易分類的案例。例如，國立臺北大學的心湖及開南大學的左、右、後溜池，在形狀上皆顯得工整、對稱，人造程度濃厚，無疑挑戰上開的分類原則(呈附錄)。

按前述的定義和特徵來看，這些存在於大專校院裡的水域在用語和概念上並未統一起來。有的校園雖命名為「湖」，但就景觀的分類應稱作「塘」(例：交大竹湖)；有的名曰「池」，然卻是「自然」成分居多的生態池，於定義上應以「塘」冠之(例：台大瑠公圳水源池)；遑論還有的是連同水域旁的庭園造景一併納入，統稱為「園」(例：逢甲大學學思園)。此外，即便是以規模來區別——通常湖的

1 楊凱傑(2023)〈交大竹湖考(上)〉。《交大友聲雜誌社》，6月13日，連結網址：<https://alumni-voice.nctu.edu.tw/?p=3874>。

面積大於池——仍能找到例外者。例如，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湖面積（約 2100 m<sup>2</sup>）便遠小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的鴿池（約 14000 m<sup>2</sup>）（楊凱傑、陳彥傑，2023）。不過基於行文一致性，以及名曰湖者為大宗，本文仍承襲楊凱傑、陳彥傑（2023）用法，以「校湖」統稱。惟認知上，應意識其更接近於景觀領域中「塘」之定義；以及，校湖如何被命名，應鑲嵌於其命名的歷史脈絡來檢視。相關的工作本研究將於後文說明。

接著，大學校園和公園之間有著部分的共通性，無論是二者可能於園內設置上述類型的人工水景，或是在特徵上逐漸相仿。夏鑄九（2016）嘗言，早期臺大的校園空間是封閉的，使用者多以校內師生為主體。然伴隨著台北市建設發展的擴張，以及當時的城鄉移民、公共建設跟不上人口遞增的速度，導致當時的大台北地區的開放空間入不敷出，從而令臺大校園成為市民近便利用的補償性綠地，形同都會公園般存在。這種校園「公園化」、「社區化」現象亦成為晚近校園規劃之趨勢，令校園除了是學生學習的環境，還是社區民眾用以休閒、運動之開放空間；而此現象亦昭示著社區時代的到來，具「取之社會，用之於社區」之觀念（陳瓊杉，1998）。順著這層理解，校園的人造水域於區位的特徵上，大抵呼應前述的水塘設計觀念，宜置於如公園等具規模之地區，講究水體與周遭景觀之間的視覺和諧。

校園和公園的相似性，不僅反映於開放綠地之近用層次，同樣運用了公園常見之庭園或園林造景元素，包括園路、橋、水池、瀑布、踏石、涼亭等。尤其園景水池，主要強調其景觀、教學和水質曝氣淨化之功能，多會搭配人造瀑布、假山和草地元素來呈現。近來校園普遍設置之生態池便屬此一類型，概念上亦雷同於前述的水塘（湯志民，2022）。進一步地，由於學校景觀是人造和自然世界形成重要關係之所在，旨在「讓孩子體會到自然和自然之歷程」（湯志民，2022: 195），使得這類以庭園空間營造為重之景觀，特別彰顯出情境教育之「境教」功能（湯志民，2006: 239）。

從歷史的角度，這一類園景論述深受台灣景觀教育自戰後以降之發展所影響，尤其與造園史的論述密切相關。1960 年代的景觀教育便係由深諳中國傳統造園理論的園藝界菁英主導，並將中式園林觀念融入教材之中。另外，戰後的庭園事業從私人園林擴張至公共領域，包括本文的校園規劃等，於是帶水池園景的造景實踐也遍及校園之中（王小璘、何友鋒，2021）。之於本文，這類案例有國立中

興大學中興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的中庭花園、逢甲大學的學思園等，皆是以水池為視覺中心，搭配著園路、橋、涼亭、踏石、山林石等中式園林元素。

再者，從環境意象的角度，套借 Lynch (2014) 論點，這類結合池塘水景的庭園景觀相較於其他的校舍建築有較高的可意象性，無論是外顯的能見度，也可能經由感官的接收，從而銘刻於心理的印象層次。進一步地，誠如 Lynch 指陳波士頓中央公園為眾多受訪者心中的核心都市意象，對於學校的師生職員而言，校園的池塘水景之於整體校園亦佔一席之地。另外，這類的場所通常也是校內的特定景點，可用於辨識和理解校園的空間結構。如同獨立高塔之於都市，它們亦屬環境意象中的地標 (landmark) 元素。例如，在清大官方網站裡，成功湖被視為提供市民遊憩和婚紗取景的重要地標；<sup>2</sup> 又者，交大的竹湖之於光復校區，它在設計之初，被賦予了區劃教學區域——以竹湖西為工學方面系所，湖東為管理和商船系所——之功能<sup>3</sup>。

不過，細究這類園藝景觀研究和觀點，其對於湖泊和水池等水域景觀的描述，仍偏重於視覺的向度，亦是傳統景觀領域後設觀看景觀 (landscape) 一概念時之視角侷限。意即，作為一種視覺性的概念，其意指為一種看待土地的方式，並且「往往是個人的主觀性加上專業的客觀性」(薛怡珍、李國忠、賴明洲, 2002: 2)。套借康旻杰 (2005: 11) 說法，這類的景觀式理解明顯偏向其視覺效果及對美學層面的強調。

## (二) 基礎設施研究與人造物政治

本文探討的對象為大專校院之校湖，由於涉及基礎設施之範疇——無論係視之為一種水利的工程設施，抑或將其看作綠色基盤設施 (如同將公園視作一種都市的綠色基盤設施) 及校園設施的一環——從都市計畫的角度，套借 Berke 等 (2009: 298) 所言，皆旨在「增進都市的發展」，係引導開發及改變都市景觀的重要角色。因此，以基礎設施研究關照本題不啻為一種理解蹊徑，並有別於傳統

2 秘書處 (2022)〈清華成功湖大整治，划船遊湖明年重現〉。《國立清華大學》，7月7日，連結網址：<https://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1094>。

3 楊凱傑 (2023)〈交大竹湖考(上)〉。《交大友聲雜誌社》，6月13日，連結網址：<https://alumni-voice.nctu.edu.tw/?p=3874>。

景觀規劃領域較側重於視覺或形式意義之探討，旨在將關注擺在技術與社會之間的交互關係。

首先，Carse (2017) 研究回顧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一詞的概念流變。基礎設施一詞源自於法語，原指那些用以支持現代社會和經濟之構造「龐大、複雜和轉換之系統」(the vast, complex, and changing systems)，舉凡下水道、鐵道、通訊等工程皆屬此範疇。套借陳怡芳 (2017) 解釋，它係由物質形式 (material forms)、物質網絡 (physical networks)，以及跨越空間和距離之流通和交換 (exchange over space) 構成之實體 (頁 167-8)；抑或，理解作是將各式元素整合起來，以發揮特定功能效用之系統 (王志弘，2018)。1960 年代，經由社會理論的翻譯，此詞隨之引入至英語學術圈，並與時興的「結構」等相關理論術語於學界裡被通泛使用著。

隨後，由於受到後結構主義的批判、社會理論思潮的轉向，基礎設施曾沈寂了一段時間。直到晚近，基礎設施方重返學界的討論，並在人類學界的「改造」下，轉而化身為兼有物質和抽象意義 (象徵、社會關係、交換邏輯等) 構成之物質複合體 (material assemblage) (Carse, 2017)。順此，林文玲 (2018) 指道基礎設施還聯繫上了社會的關係和運作等結構，包括指向著異質的所在、人群或國界，有著不甚相似的連結、不被連結或 (被) 阻斷的日常或可能；以及，基礎設施作為某種隱蔽的基底 (infra-)，支撐起社會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運行，其物質性的條件與效應亦與社會的形構之間有著交互作用之緊密關係。

同樣地，現今基礎設施研究亦不侷限於將基礎設施當作特定科技或人造物、物質系統，還涵納了對於「事物之間的關係」乃至「建立、連結和維繫關係之過程」之關切，並積極探問其「支撐社會生活的基礎設施之形成、運作、崩解、再現、認同、權力、自然生產及社會正義等議題」(王志弘、高郁婷 2019；賴子儀、王志弘 2021)。其次，基礎設施研究的對象除了涵括道路、橋樑、自來水系統、水塔、人行陸橋 (王志弘，2018；王志弘、李涵茹，2018；李蔚、王志弘，2021；張晃維，2009；蕭珖綺，2021) 等工程技術物外，其觀點也運用於墓葬 (賴子儀、王志弘，2021)、藝文場所 (王志弘、高郁婷，2019)，甚至包括了高等教育課程中的社會實踐 (陳怡方，2017) 等非傳統基礎設施範疇之關注對象。對於後者研究，其採取基礎設施研究之立場，分別旨在將其視作紀念性、文化性和社會性之基礎設施來看待，具備了支持和維繫社會運作之能力，並暗示著基礎設施研究的分析潛力。



若將湖視作為基礎設施，本文認為除了認知其作為兼具景觀與水利設施等關鍵基礎設施外，誠前言所述，尚需留意到其社會、政治與文化之向度。按 Klinenberg (2021) 對社會性基礎設施定義，其意指「決定社會資本能否發展起來的實體條件」，也是促成社會交往、連帶形成之前提。這類的實體通常指向公共機構（圖書館、公園、學校）及民眾能隨意聚集與流連的商業空間（咖啡廳、書局等）；而像堤防、自來水廠等關鍵基礎設施通常不會是社會性基礎設施。不過，這一類的設施仍然可能透過設計，兼具開放空間之遊憩功能（如堤防和公園兩用之水岸公園堤防），成為支持民眾公共生活之公共場所，因而也是一種社會性基礎設施。

至於政治的層面，Winner (2004: 130) 以摩西斯 (R. Moses) 的公共建築計畫為例指道：摩西斯在替美國紐約長島規劃一條前往瓊霓絲海灘 (Jones Beach) 的公園大道時，嘗「透過低架橋的特殊設計來使公共巴士無法行經他所設計的公園大道。」而此舉背後的目的，旨在讓「擁有小汽車的中上階層白人使用他所設計的公園大道進行娛樂或交通」，並以此阻饒高大的巴士（也是黑人或窮人仰賴的運輸工具）通過來前至白人聚集的海灘，從而令橋樑成為排除特定社會群體之政治物。對於 STS 研究者而言，這是說明人造物何以與政治形影不離的範例。不過，有的批評者則認為 Winner 一文分析流於靜態，理由是「某物過去的所為，並不必然意味著它現在的模樣，更別說它未來會成為什麼」。具言之，後來人們的使用未必照本宣科，而係可能偏離其設定，或者予以重新劃界。因此，人造物的意義無法單由設計決定，其「意義總是要在使用中發現」(Matthewman, 2023: 157)。

接著，就文化的層次，Larkin (2013) 則指陳基礎設施亦蘊含一套詩學模式 (poetic mode of infrastructures)，令基礎設施的「形式從技術功能釋放而出」(form is loosened from technical function)，並關涉基礎設施的象徵傳達，從而令基礎設施得以取信於民。這點常見於現代國家試圖經由基礎設施的建成與宣揚，以此標誌國族的文明進步和優越 (頁 335)。此外，Larkin 也論道，基礎設施的詩學除了通過表徵呈現，也可以是具體的感官體驗，滲透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層面，並支配著我們的觀念；以及，「創造了一種現代性的感覺 (a sensing of modernity)，在這個過程中，身體和心靈理解什麼是現代的、多變的和進步的」(2013: 337)。總的而言，這套發軔於基礎設施的詩學模式旨在創造出「宛若」(as if) 之政治展演，令公民產生進步與認同等幻覺，以利設施取信於民方而運作無阻 (王志弘、黃若慈，2018)。

### (三) 國內水利設施研究與其視野

國內研究水利設施之社會科學文獻裡，本文留意到以埤圳和管線之研究者展現了數種不同的認識論途徑。前者研究裡，其主要係將埤塘視為特定時代下之技術產物，亦為緊緊繫於地方政經、社會等脈絡之重要相依，表現在其捲入之資源分配、利害關係等面向。例如，邱郁云（2009）對八堡圳的研究裡，指陳農業灌溉時期農田水利會對於水圳空間與水權等控制，並隨著地區的工業化，重組其對該設施與環境之部署，以及轉化其在地之政經、社會等關係。此點也顯示了埤圳的定位既取決於其權力的主體與施為，亦受到外在時空環境所影響。具言之，農民早先主要仰賴埤圳以協助灌溉，然隨著現代化水利系統之建置發展，埤塘原有的功能為之取代，並改朝永續發展的模式邁進（李宗鴻、彭慧芳，2017）。

之於本文，部分校湖案例在過去的確為農業聚落之埤塘與水圳設施一環，並經大學校地的劃設，方而納入到校園的治理體系之中；以及在用途與定位上，其從原先經濟性的水利設施，轉變為校園的景觀設施與開放空間。例如，台大醉月湖的前身牛瀆池本為農家灌溉用的埤塘，附屬於瑠公圳大安支圳水系；<sup>4</sup>國立中央大學（央大）中大湖，便係因著大學校地的劃設與規劃，於是從桃園一眾無名埤塘之中躋身為有名之湖（楊凱傑、陳彥傑，2023）。而改造為校湖後，湖面及湖畔一帶尚設置亭子、拱橋等遊憩設施與親水開放空間，亦為前述所謂之社會性基礎設施，即化身為令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性互動與交流得以發軔與附著之物質載體。

至於水體管線的基礎設施研究裡，探討的核心主要圍繞於此項民生設施的失靈，致使人們意識其重要性和對其之依賴。李蔚、王志弘（2021）以社區自來水管線的供水爭議為例，指陳供水基礎設施的運作不彰，使得居民意識到平時隱形的自來水管線實則為維繫社區民生得以運行之關鍵角色。進一步地，當基礎設施產生危機的時刻，卻同時也是社區組織動員的契機，從而令社區「捲入或投身於基礎建設的建造和維護」，亦彰顯出人造物如何化作推進社區公共性之途徑（頁24-5）。

---

4 教育部、國立臺灣大學（2003）《瑠公圳（臺大段）復原整體規劃設計》。2003 全國生態工法博覽會。

另外，基礎設施研究除了探問這類的管線能否運作無阻，亦關切其能否得信於民。王志弘、黃若慈（2017）回顧歷年台北市供水治理體制的發展，指出過去市府供水水質不佳，失信於民，於是透過安排政治人物生飲自來水等政治表演，以重振市民的信賴及塑造自來水和進步市民之間的形象連結，進而讓供水設施在社會層面得以運行。於是理解，基礎設施的運作順暢不僅關涉到水利系統技術的支持，亦需社會的配合方能無阻；而其中「遊說社會」的過程亦呼應前述 Larkin 觀點，令人造物關聯於詩學層面的象徵與認同之課題。

從空間的角度，黃書緯（2022）與張晃維（2009）研究則提供了水利基礎設施立足於空間向度之論述基礎。黃書緯（2022）以金門供水網絡為例，透過檢視金門水庫與管線興建之二個時期，展現水資源治理過程中的領域生產與邊界實踐。張晃維（2009）通過兩座社區獨立型水塔觀察，發現到人們視之為空間還是地方，取決於其人對水塔的認知和認同之深淺；而對於水塔的地方性認識，則需將其鑲嵌於地景的脈絡來檢視。

呼應前述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探討，二份研究呈顯了基礎設施所蘊含了領域政治與地方歸屬之空間面向：黃書緯（2022）關於供水設施的領域性描述，涉及了邊界的劃界與跨界互動。照前述對於 Winner（2004）技術物產生的空間—社會排效果，以及後續反論呼籲探見使用促成之設定偏離，相關的討論仍圍繞於二種邊界之互動。張晃維（2009）關於水塔的地方探討，既呈現出如 Kaika（2005）「都市嫁妝」之地景意義，即水塔顯現特定都市地景風貌與象徵；同時，也接近於 Tuan（2018）所謂「戀地情結」（topophilia），即「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所有情感紐帶」（頁 136）。之於本文，二種分析取向不啻為本研究提供可資定錨之分析切面。下文部分，本研究即延續上述基礎設施探討，具體說明領域與地方的概念如何聯繫上校湖的政治與詩學二個面向，並運用上開概念作為本文分析架構之關鍵要素。

### 三、研究分析與設計

#### （一）分析框架：為校湖畫探索地圖

回返本文前言的核心關切：校湖除了是關鍵基礎設施外，它同時還可以是什麼？循著基礎設施的命題及透過相關文獻之對話，本文認為校湖的基礎設施意義

如同金字塔般結構，可從最基礎的、作為純粹技術、功能與工具性般存在之關鍵基礎設施，依序涵括到作為開放、公開之社會性支持場所(也是社會性基礎設施)，乃至關乎自身蘊含之政治與文化的意義層次。

此一排序自有一套邏輯：校湖首先必然是實用導向、兼具水利與景觀等複合功能之設施物。全台 87 座校湖裡，蓄洪池便佔了大宗，或者說凡是校湖者，通常兼備此類調節水文功能；其次，則經環境的綠化處置，又多了攬景與促進環境美質之景觀功能。好比國立政治大學的景觀湖旁，既設立了標示「蓄洪池」指示牌，周遭的導覽解說牌則指其為「景觀湖」。接著，誠如 Klinenberg (2021) 所述，經由設計，關鍵基礎設施是可能附加開放空間之功能，令人與人的交流與連結得以發生。例如，部分學校如清大、台大等，數次整治湖畔一帶親水空間，能見環湖步道、過橋等開放空間元素，從而多了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一面。

進一步地，伴隨民眾的涉入與使用，校湖因而也衍生了相關的近用規範與對其場所評價與體驗等，並牽涉到校方對於該設施之環境管理與景觀的象徵工程建樹，為之納入校園治理的一環。事實上，夏鑄九 (2016) 等研究關於校園的「公園化」現象，便留意到校園空間因著更多市民的使用和越發多元的活動等，校方也有相對的治理因應。這意味了在基礎設施的社會基礎，即那些關涉於人之於場所的使用、體驗、詮釋、認同等要素之上，其政治與文化的意義得以為之體現與由此開展。

就次序而言，校湖的政治與文化的意義層面係處末位，也是本文認為有待審視或需特別關注的面向。本文的理由有兩點：其一，無論是 Kaika (2005) 或是其他基礎設施研究學者，皆強調了基礎設施喻含之明暗關係，無論指向其實體或象徵維度之隱匿與公開的性質。而順著這層明暗隱喻的思考，本文覺察到既有與校湖有關研究，仍多聚焦於對其設施本身於環境工程與開放空間之能效層面的檢視。再者，王志弘 (2018) 對既有道路研究的批判亦然適用本題，即現有文獻要不「偏向採取實證主義、行為主義、理性人及效用極大化等預設」(頁 6)，要就罕見探討社會面或將其簡化為政策和法規研擬、經濟效益之分析物，從而欠缺對其社會、政治與文化等過程之探討。應此，本文的工作有意將這些隱而未言的意義與過程發掘出土，以令校湖在這些層面上得以「化暗為明」。

其二，Matthewman (2023) 評論 Foucault 與 Benjamin 思想中關於技術物的認識，啟發了本文對於校湖政治與文化向度之關注：前者指向了技術物(像是全

景敞視建築的觀念)如何經由設計方式,使權力內化並塑造溫馴的身體;後者則令技術物成為拜物教般存在,成為個人投射「願望形象」(wish image)之所在。而二種取向使本文覺察到校湖可以同時是權力與象徵競逐的場域。當然,對於校湖於政治和文化面的強調並這不意味校湖作為關鍵或社會性基礎設施在此毫無重要。誠如前述,二者實際扮演著支持校湖其政治與文化層面得以體現與開展之前提。只不過相形之下,就像前段所述,二個面向是有待解謎之隱題。

奠定於關鍵基礎設施與社會性基礎設施的前提,以及指認本文鎖定分析之政治與文化面向,本研究進一步搭建研究分析架構,並進一步搭建二個面向所需之分析要素(呈圖 3)。細究基礎設施的政治與文化二個面向,Winner (2004)關於人造物政治的觀點,以及 Larkin (2013)提出對於基礎設施詩學層面的關注,提供了本文了立足之論述骨幹;而黃書緯(2022)與張晃維(2009)研究則指引本文從校湖的領域、地方之關係以檢視與闡述其中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就基礎設施的政治面,Winner (2004)以摩西斯造橋為例,表明空間的特意安排與設計係可能達成族群隔離之社會排除效果。從理論工作的角度,其可從「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領域」(territory)之間的概念互動來理解。權力意指「人們對他們所要做或去完成的事的決定能力」,且「有權力的人也能夠形塑別人的意見和作法,而無權力的人只能跟隨」(王振寰,2014);定義大抵不脫其具有之「強制力」(coercion)與「宰制」(domination)意涵(王業立,2021)。接著,政治學在探討權利一概念,傾向將權利措置於與國家權力之間的互動來認識。如積極(positive)權利論者主張權利來自政府權力;規範(normative)權利論者則認為權利來自前者以外之道德、宗教、理性、自然法則等來源(Stone, 2007)。綜合上述論點,兩者關係誠可理解為:有「權力」者能夠決定無權力者行使事務之「權利」。

進一步地,權力之於領域,則可表現為「領域可以促進或阻礙權力、控制、自決與團結的運作」;而領域發揮之作用與過程則透露了「領域化是權力的表現」(Delaney, 2017: 25)。以這三個概念重新審視 Winner (2004)研究,我們則可以將前述摩西斯造橋一類的現象理解為政府權力經由領域的劃界,促成不同社會群體在近用特定領域時有著根本上的權利分別。

校湖既是設施,同時也佔據一地理範圍,因此也是一種有形的領域。如同摩西斯造橋的例子,校湖的規劃與配置、命名的過程便關涉到何人有權力來行使與

做決定。這些權力的力量既可能塑造了有形的領域內涵，如校湖的區位、規模、形制等，也影響了無形的領域，像是人們可使用的湖畔範圍、遊憩項目或是稱呼的方式等。尤其後者，尚關乎到人們近用校湖空間的權利，像是使用的資格（師生或市民）、權限（有無申請或具備水上活動專業背景）等；而這些項目進一步地反映校湖所在領域之公共與開放的程度。當然，Matthewman (2023) 也提醒道，人造物的使用也可能令其偏離原先設定，即權利的一端未必總是被動、受支配的一方。對應本文分析架構，在此可設想為權力與權利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並可由領域這個要素面向來顯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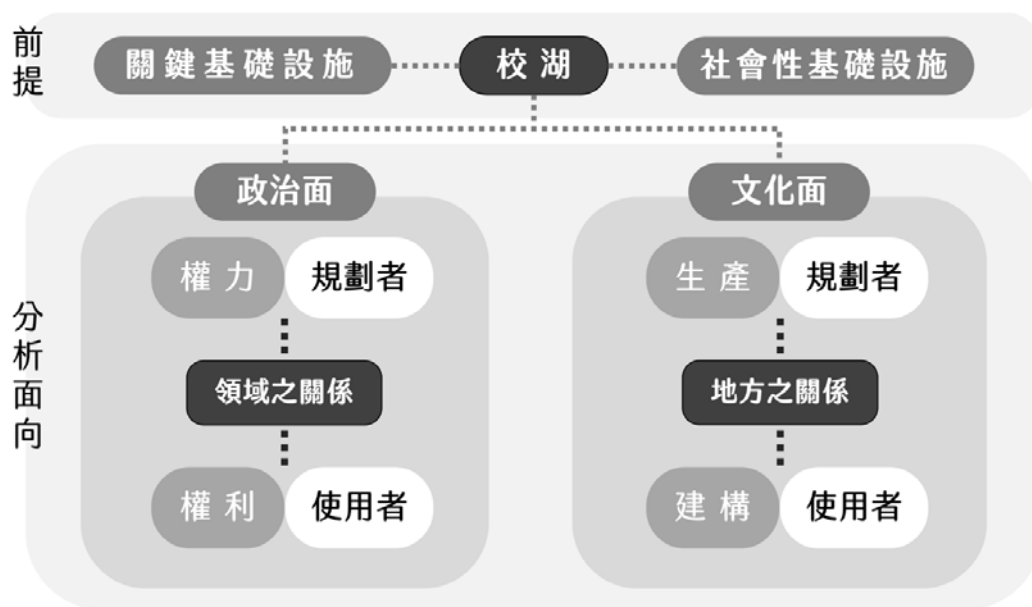


圖 2 本研究框架（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至於文化方面，Larkin (2013) 指道國家透過基礎設施的技術展演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以塑造自身的形象，以牢繫人民對其信任與認同；以及，誠如王志弘、黃若慈 (2018) 所述，這個對進步表徵的追求背後則指向國家的「落後焦慮」。然而本文認為，基礎設施主體的情緒隱喻除了指涉對「面子」的正反回應外，尚存在其他類型。首先，關於主體的對象，上述研究皆預設為政府，並且是單向地由政府向市民施以技術展演。校湖亦然。不過從前文規劃者之於使用者的角色互動關係，本文認為主體亦當涵括到師生、市民等使用端的能動者。就像張晃維 (2009) 對於水塔的地方狀態認定取決於水塔所在的社區民眾，而非國家與政府。

順著地方的概念，前述的主體反應則指向「地方感」(sense of place) 概念。地方感指的是「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依附」。這類的地方感可以發軔使用者的場所經驗，例如，交大竹湖落成，往後的交大畢業紀念冊屢見其影像，部分的年度選題有對於場所的離別不捨。當然，對於地方的依附也可以是促成再現的理由，像是部分校園湖畔（興大、臺師大林口校區等）中式園林造景再現為與中國原鄉之間的地方連結。另外，地方作為人類創造的「有意義區位」(meaningful location) (Cresswell, 2016: 14)，也關乎著地方意義的空間社會生產與社會建構。社會生產關注地方形成的歷史性背景、政經時空等生產脈絡；社會生產則指向地方的意義係經人們的記憶、感受、想像、社會互動與日常使用建構而來 (Low, 2017)。蕭珧綺 (2021) 奠基於 Low 理論基礎，指陳基礎設施的地方意義發軔於其社會生產與建構的張力之間，遂從生產的非地方(基礎設施)邁向建構之地方。置於本文的分析裡，二者分別聯繫上校湖的規劃與使用兩端，並從兩者互動之地方關係來認識。

## (二) 研究設計：研究場域、資料取得與分析

### 1. 研究場域

奠基於楊凱傑、陳彥傑 (2023) 調查基礎，本研究除了延續補充遺漏之校湖名單與點位，也根據前面基礎設施研究的向度排序，擇以台大醉月湖、交大竹湖、清大成功湖、成大成功湖、興大中興湖作為本文主要考察之代表場域 (呈表 1)。具言之，由於本文企圖發掘校湖具有之多個面向與意涵，尤其是政治與文化的層面，上述五個場域既是校園中的關鍵基礎設施、社會性基礎設施，同時也高度寓含校湖的政治與文化向度有關之現象單元。

除開理論上的理由，就現實層面，由於五座校湖得利於較長之歷史 (皆超過四十年)，現有的資料最為豐富，並涵括以上四個向度。此外，本研究也留意到這五座校湖所屬之教育機構皆為傳統國立大學，其經費來源主要來自國家預算之挹注。在某些時候，它們展現著如同國家般角色，由上而下地將權力落實於校湖的各式面向，包括體現在命名的政治、水域的規劃、景觀美學中的意識形態，乃至其回應外在環境 (大學公園化、社區化) 所做的治理調整等層面。

惟五個場域資料仍散見於各式文本材料，有待研究蒐集與彙整。本文認為強調校湖是否具長久的歷史是有意義的。這點不僅吻合「技術被設想為合宜人類歷

史的基礎」論點 (Matthewman, 2023: 117)，或是 Low (2017) 在空間的社會生產背景與社會建構中使用者造就地方環境與意義之變遷，指引研究須立足於歷史來指陳本研究所關注之課題。而相映於本文對政治與文化關注，有著長遠歷史的校湖場域亦襄助研究探見其領域與地方過程中存在著可能的多重階段與態樣。若我們以新興的校湖為考察的案例 (例：開南大學的左溜池、右溜池、後溜池)，其不僅為新闢設施，可及官方資訊與紀錄甚少 (僅知位址與用途)，較難以獲取滯洪池以外之社會、政治、文化等基礎設施層面之意義。

表 1 本研究考察場域

場域	建成時間	場域概要
台大 醉月湖	1973	前身為埤塘「牛滴池」、動物系實驗水塘。湖名係於 1973 年由時畢業生鄭梓、蘇元良命名，其名寓含浪漫之意。湖面積約為 8,433m <sup>2</sup> ，格局為一大二小三池，大小池間有橋區隔，大池的中央設有一華式亭子，名曰「湖心亭」。同一校園內，尚有瑠公圳水源池、弄春池之水域。
交大 竹湖	1979	前身為一窪地，經改造為湖。湖名係於 1980 年，經由交大校方向校內外徵名和校方票選而出，並以茲紀念在台復校校長凌鴻勛 (字「竹銘」)。湖面積約為 12,165 m <sup>2</sup> 。湖畔設有一幾何造型白亭「振吾亭」，以茲紀念前校長李熙謀。同一校園內，尚有西區滯洪池之水域。
清大 成功湖	1939-44	前身為日軍的蓄水池，後納入清大校園，經時朱樹恭教務長提議借名聯合國臨時總部鄰近之湖「成功湖」而得今名。湖面積約為 33,000 m <sup>2</sup> 。湖中央有「湖心島」及「西瓜島」二島，其中湖心島和湖岸有校友捐建的「克恭橋」連接；而湖心島上還設有草蓆式小亭「寄梅亭」，以茲紀念前校長梅貽琦。同一校園內，尚有昆明湖、相思湖之水域。
成大 成功湖	1970	原為國軍停車場，後因鄰近校地興建操場需用土，經前校長羅雲平提議，於 1970 年挖土順道鑿湖。成功湖沿用校名命名。湖面積約為 2,493 m <sup>2</sup> 。湖中央有一島名曰「湖心島」，並有一拱橋連接。湖周邊有文學院、小西門、榕園等建物和設施相映。
興大 中興湖	1978	湖的前身為農地。戰後，中興湖係經由前校長羅雲平提議，並帶領師生戮力闢建而成。湖的面積約為 14,843 m <sup>2</sup> ，湖的形狀為中華民國疆域 (秋海棠) 造型，呼應校名之中興意涵。湖和湖畔一帶環境見本文開宗描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當然，縱使五個場域涵括了多種校湖的可能樣貌、情形，不過考慮到有漏網之魚，或者補充舉證之需要，本文實際的分析裡亦佐以其他校湖案例來舉例說明，例如：國立臺北大學的心湖、國立東華大學的東湖與華湖等。

## 2. 資料取得與分析

應此，相關文本材料的取得，本研究係以蒐集相關次級資料和檔案為主，當中涵括各校的公開資訊（規劃報告書、校內各式會議記錄等）、校史、校友回憶、歷史圖資（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等；以及，經由社群媒體的公開貼文以蒐集部分人士提供之相關使用者的現身經驗。<sup>5</sup>另外，研究者亦實際前至五座校湖現場進行空間盤點與參與觀察，以補充檔案所不足資訊，以及從中覺察本研究有待發掘與發展之校湖課題（呈表 2）。

表 2 本研究資料來源、種類與項目

來源	種類	項目名稱
檔案	校史、校刊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成大》(校刊) etc.
	規劃報告書、校方會議紀錄	《國立台灣大學瑠公圳舊址復原及小椰林道段渠道景觀工程規畫構想》、交大行政會議紀錄 etc.
	校友刊物、回憶錄與出版物	《成大傳奇》、《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成大)、《友聲雜誌》(交大) etc.
	報章媒體	過期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 etc.)、校園通訊
	其他來源	畢業紀念冊、校園告示牌、校園地圖、校園導覽手冊 etc.
現調	空間盤點	(五座校湖) 水體的區位與配置、湖畔設施 etc.
	參與觀察	(同上) 環境體驗、使用群體與活動 etc.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的資料分析則主要參考張芬芬(2010)「質性資料分析五步驟」操作，即文字化、概念化、命題化、圖表化以及理論化之步驟，予以不同程度與程序之處理，包括到：將相關屬性懸殊之資料(data)經過初次的文字化轉譯(例：將

5 研究者曾於臉書社團「NTU 台大學生交流版」及「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 116 級」向網友邀集有關校湖的使用經驗與回憶等回饋。本文引用這類留言時，另以註腳注明之。

湖的外觀以透過文字描述），概念標籤及分類（例：湖或池；無名、有名或有獨立、專屬名稱）；人工、半人工或天然），引伸各式類別命題（例：有專屬名稱的校湖，其歷史和意涵也最為豐富？相較於無名的湖泊和滯洪池等而言），並予以資料的視覺化（例：各校湖湖泊與水池分佈）和以論證圖示（例：分析架構）方式，以呈現最終的資訊（information）。

以下，本文將考論和本研究相關之理論觀點，涵括園藝景觀至基礎研究設施研究，嘗試從中指陳其觀點可資借鏡的觀點及其未竟之處，進而帶出基礎設施研究中的政治與文化之分析主張。

## 四、校湖的權「力」與「利」

### （一）校湖的權力領域：規劃與命名之權力地景

從政治的角度，權力的意義具體展現於行使權力的主體（通常以校方行政單位居多）面對校湖的設置、命名、設計等規劃過程之態度，以及通過觀念的主張、空間的安排等手段來推進過程。除了展現於過程中的權力意義，權力亦可經由下層的物質樣態，即透過校湖的建成環境，以傳達上層的文化意識形態。以下，本文將分成水體的規劃與配置、命名二個子題，帶出校湖的權力面探討，以及權力於過程中所促成之領域變遷與邊界互動。

#### 1. 水體的規劃、配置與領域更迭

校湖作為校園建築與景觀的一環，無可避免論及其校園規劃之生產。回溯戰後初期，諸所新興大學和在台復校之學校，既尋覓校地，也亟需規劃新校地的環境。照見當時的做法，諸所大學通常會將校園規劃交由著名建築師和事務所執行。例如，中大、中央警察大學、東海大學、交大光復校區、臺師大林口校區之校園規劃，皆出自陳其寬建築事務所之手；而其「對於中式空間如何在現代主義的手法上，頗有心得」（謝明達，2016: 250）。像是臺師大林口校區便將含水池的中庭花園、唐式合院格局、圓形鏤空迴廊牆面、紅瓦斜屋頂融入現代建築之中。由空間專業者操刀的例子還有台大醉月湖，係由校內園藝系教師凌德麟主導設計；而凌氏則為當時深諳中國造園理論的園藝菁英（王小璘、何友鋒，2021）。簡言之，

校園空間的設計不啻反映了建築師的美學品味，也透過主導校園的景觀設計（包含校湖在內）以體現其內心的現代性國族美學觀（沈宗憲，2012；梁碧峯，2016）。

另外，對於校方而言，校園裡設置校湖的主張並不罕見，有的甚至付諸實踐。例如，國立東華大學創校校長牟宗燦曾分享道，當初他在推動校園規劃時，與相關籌備人員參訪國內外大學校園，從中激發靈感。他發現國際間各大名校校園中都有湖，於是心生東華之湖的構想，也促成了後來的東湖、華湖。<sup>6</sup>台大前校長閻振興則是在參訪清大後，受其成功湖及週邊休憩空間啟發，遂將校內的動物系實驗池改造為今日以遊憩為主要用途之醉月湖（吳密察，2013: 359）。相繼任教成大和興大校長的羅雲平嘗言道：「大學要有個湖，湖畔要有小徑，讓學生在此漫步，思考人生。」並在他任內推動了成大成功湖與興大中湖的建造（楊凱傑、陳彥傑，2023）。綜觀上述例子，本文也從中發現到大學校長在推動校湖建置之過程裡扮演著決策的權力核心。

從大學校長的治學觀念裡，可以察覺到教育是推動校湖的考量重點之一。除開此點，實際上其也可能包含到如實質景觀及排水功能等考慮。例如，設計國立東華大學校園的建築師曾論道：「這個校園（東華大學）這麼大，假如平平的，就會太單調，應該要創造一些河流及湖泊出來。」故而有了東湖、華湖之設置。<sup>7</sup>再者，就過程而論，有的校湖之建造則帶些「順勢而為」之成分。例如，清大遷校新竹後，沿用了日治時期海軍於當地設置的蓄水池與池畔一帶的福利區規模，轉作為後來的成功湖與湖畔一帶的學生餐廳、社團辦公室、活動中心（王俊秀，2023）。交大於 1970 年代規劃與建造光復校區時，將校內一小山頭剷平，並利用其土堆將鄰近窪地的開口處封住，形成今竹湖之原型（鄧啟福、周湘雲，2020: 171-3）。成大成功湖過去則是停車場，後來鄰近校地為了闢建運動場，需用土方，於是從停車場攫取；而開挖的停車場土坑於是順勢建為成功湖，成為了運動場的「副產品」（校史編纂小組編，2001: 254-5）。由上可知，校湖的建成也有賴於既有的實體條件之配合。

6 陳惠芳（1995/10/1）〈東大景觀湖，引人入勝：野鴨戲水群鳥競艷，吸引師生流連忘返〉。《中國時報》，版 13。

7 吳明達（2019）〈東華三湖介紹〉。《國立東華大學數位校史館》，3 月 27 日，連結網址：<https://rb001.ndhu.edu.tw/p/132-1001-2245.php#spid=4>。

除了上述層面，前面提到的中興湖還關聯於昔日的勞作體制之背景。1930年代，教育界有鑒於國難方殷，認為知識份子應肩起國家興亡責任，自歐美引進勞作教育制度和精神，此套制度也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引入台灣（曾騰光，2002）。1977年，前校長羅雲平和時勞作指導組主任石騰芳便率全校師生一同破土鑿湖（蔡宗憲，2019: 48）。「我因參與工讀」對於當時開挖的過程，校友陳欽忠（2010）回憶道：「曾在開挖任務中略盡棉力，手推鐵筒，壓實土泥的影像，恍如昨日，因此對中興湖感情之深」（頁 63）。或可謂勞作教育體制下的產物，亦是權力有上而下動員之展現。

另一方面，校湖同樣牽涉到到校內乃至學校與地方之間的資源分配、競爭與協商。例如，挹注東華大學校湖的水源木瓜溪，經校方與在地農民協商後，雙方確認決議以農民需要之灌溉用水優先，用剩的才配發東華校園使用。除此之外，即便是在校內，校湖的設置同樣也可能涉及校內不單位與團體之間的利益關係與折衝。例如興大的中興湖當初在規劃時，數度還引起校內人士反彈，其中的理由包括指摘為了湖區的建造而犧牲掉了試驗田之用地，乃至提議待羅校長卸任後將湖埋除。校方行政單位為此與校內異議者斡旋（黃天久，2010: 38）。簡言之，校湖的設置實則牽涉了校內乃至校方與地方之間的資源分配及角力過程，亦屬政治層面之課題。

從領域的意義而論，規劃除了促成水域之地理空間範圍之更動，亦可能重新界定其定位與設定（用途、使用群體等），並取決於所屬的場所。以台大醉月湖為例，其湖體與湖畔一帶之地景樣態，按土地利用、地景特徵等層面，可略分為五個領域階段（呈圖 3）：醉月湖最早名曰牛滴池，過去係瑠公圳大安支圳，也是當地農村聚落灌溉用的埤塘設施。因此，牛滴池是經濟性的水利設施，並由當地農民共同使用著。而從日治時期的地圖也可以見到，當時的校地零星分佈，埤塘一帶仍以農地為主（綠色區域為農地，紫色則為校地）。

爾後，牛滴池劃入台大校地，並轉作為校內動物系的實驗池所用。從地圖的變化則可以發現到，農地萎縮；校地則擴張並將農地包圍著。就水體而言，其從經濟性的埤塘設施變更為研究與教學用之實驗魚池；以及，就設施的歸屬，水池也因成為了校產，令使用的群體由校內師生所取代，於是呈顯為「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之現象。套借 Delaney（2017）說法，領域化的意義展現在水體設施（也是一種領域）如何部署於校地擴張與教學需求的脈絡之中（頁 24）。

接著，1969 年的地圖顯示了實驗池已有今次醉月湖一大二小池格局；而周遭的土地幾乎為校地淹沒，農地所剩無幾。不久，該池則於 1973 年改建為今次的湖體及命名為醉月湖。就水域而言，功能由魚種養殖與試驗之教研用途，轉型為景觀、遊憩之用。到了 80、90 年代，開放的校園空間吸引越來越多的市民前至湖畔一帶駐足，也能見到醉月湖一帶增設了步道、拱橋、亭子等遊憩設施（呈圖 3，紅點為遊憩設施之位置，墨綠色虛線則為湖畔步道）。而湖體用途的轉變、附屬遊憩設施的出現則意味了校湖始兼具有社會性基礎設施之功能，並呼應了夏鑄九（2016）對台大公園化現象之觀察，呈現公園化、社區化趨勢（晚近「無圍牆大學」即是此一現象的具體口號與呼聲）；以及，醉月湖和校園的開放空間不再僅由校內的師生使用或限制特定用途，而係捲入外在的市民社會領域、都市化脈絡，模糊了校園的使用邊界，於是呈現「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態勢（本文稍後另作詳細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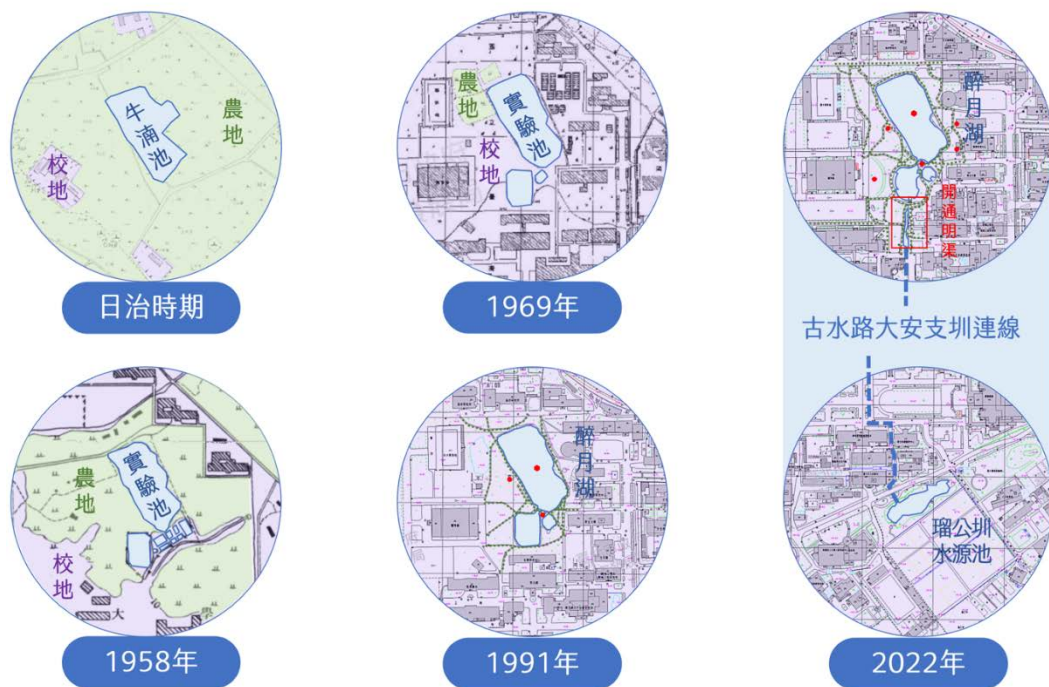


圖 3 台大醉月湖之領域變遷（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隨後，從 1991 與 2022 年的地圖變化，可以明顯探見湖畔一帶的遊憩設施與湖畔步道皆增加，呈顯此處的休憩使用仍延續先前的公園化趨勢。市民頻仍進出與使用醉月湖現象，隨之也出現如投湖身亡與虐殺動物等不當使用之課題，影響校方於湖岸設立欄杆、加強巡邏與勸導等空間安全之治理因應。這部分牽涉到校

方對於近用校湖空間之權利範圍等課題，如對不當使用行為予以限制（設置湖岸圍欄、加強巡邏）或是對近用的資格與範圍明令化等作為，本文稍後將於下一節關於校湖的權利與領域之探討另作說明。

最後一個階段則與瑠公圳的復育工程計畫有關。前面提到，醉月湖原為瑠公圳水系之節點。校內部分的圳道於 1985 年後轉地下化。直到 2000 年後，經瑠公農田水利會和部分台大師生、校友的支持下啟動瑠公圳復育工程，並於 2003 年完成舟山路南側之瑠公圳水源池之興闢。然後來因經費斷炊，工程停息數年，直至 2015 年重啟計畫。隨後的工程重點旨在運用明渠的景觀手法以重現醉月湖旁的古圳道路線；以及，透過修築與標示出水路的方式，將醉月湖和瑠公圳生態池串連了起來，甚至還聯繫上台北都會區內的其餘瑠公圳水系。<sup>8</sup>就領域的意義，醉月湖不再只是孤立的場址、景觀，而是讓水體意義延伸，成為整體網絡中的節點，變更其地理尺度之意義。連同上述校方對於校湖近用權利之資格與範圍的管理，兩種不同層面的改變皆指向了校湖的「再領化」(re-territorialized)。

## 2. 命名的決策與劃界

校湖命名的過程本即是一種政治，涉及到名稱由誰有權為其命名。以清大的成功湖為例，昔日聯合國臨時總部附近有一小湖叫成功湖，據傳清華大學前教務長朱樹恭想起這座湖後，建議取名為之。國立臺北大學心湖亦然。創校的李建興校長主張湖名應由名人命名；而身為虔誠的佛教徒，李校長認為聖嚴法師無疑是最佳人選，於是薦請他來為湖命名。<sup>9</sup>在此，湖名的命名權力掌握於校長與其他行政高層身上。

除了由上而下、由校方行政高層命名湖的過程，其也可能係由下而上者。台大醉月湖的案例裡，湖名的發想便發軔於校內學生。醉月湖在規劃和建成之初的階段並無名字。直到 1973 年，臺大歷史系的鄭梓和心理系的蘇元良在籌備畢業聯誼會的划船比賽時，考慮到沒有湖名可能不利於賽事的宣傳和海報、文稿的撰

---

8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瑠公圳舊址復原及小椰林道段渠道景觀工程規畫構想》。連結網址：<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file/10344/27458/eaf50364-610f-4645-8e71-d99cc9b406ba.pdf>。

9 李建興(2009)〈心湖勒石：追思聖嚴師父〉。《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3月9日，連結網址：<https://www.npf.org.tw/3/5540>。

寫，故二人構思起湖的命名。醉月湖一名是在某個晚上由鄭梓脫口而出，且在二人覺得其名浪漫，且比起取名成功湖、勵志湖來得佳故採用之（蘇元良，2009）。

再者，除了上述兩種命名的途徑，湖的命名亦可能同時來自兩方，交大竹湖即是一例。關於「竹湖」一名由來，可回溯 1979 年的徵名過程。當時的《交大友聲》曾昭告道：「〔交大〕光復新校區以人工疏濬一湖，現校方正擬為該『湖』錫一佳名，盼能集思廣益，徵求大家意見，以做決定。」而當時入選的提案包括了「竹湖」、「竹銘湖」、「銘心湖」、「竹林湖」、「竹賢湖」、「竹茂湖」、「成功湖」、「思源湖」。最終，經行政會議表決，採納校友朱登皋、方賢齊不約而同提出的「竹湖」命名提案。<sup>10</sup>

命名的對象除了水域本體，亦涵括那些附屬或鄰近於水域的設施物。這一類的設施常見由捐建的校友命名。例如，清大成功湖上的「寄梅亭」，係由校友翟克併捐建、胡光庶命名，茲以紀念已故校長梅貽琦；同一座湖上還有一座聯通湖岸和湖心島的「克恭橋」，其名來自校友翟克併為紀念其兄翟克恭（亦為校友），並經捐建得名（陳力俊，2020）。晚近，清大為了推動成功湖的整治廣向校友募集經費，並在整治完成後，在新增的設施冠上捐建的校友名字，像是數學系畢業校友胡國琳冠名捐建「玲玲與國琳生態步道」、「再漢水岸」、「來于翠堤」，物理系陳昱寧校友冠名捐建「昱寧島」，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冠名捐建「進步碼頭」（呈圖 4）。<sup>11</sup>

無論是校湖水體本身抑或周邊設施，其命名既是權力作用過程，同時也是領域化的展現；二者合而為一，指向命名產生之劃界效果。此處的劃界指向個人如何透過聲譽、捐款題名等方式，將自身對於學校的歸屬與認同銘刻與加諸於實體的邊界之上，甚至反過來傳喚與強化師生、校友之歸屬與認同，進而也在象徵的層次起劃界之效果。誠如 Lukes（1974）對於權力之觀察，權力不僅流轉於決策或非決策之間，也表現於文化面。此種權力通常指向主體透過如形象的美化等方式，以支配他人的思想、慾望與需求。諸此論述亦接近於 Larkin（2013）和王志弘、黃若慈（2017）強調基礎設施的形象工程旨在達成其取信於民之目的。

10 楊凱傑（2023）〈交大竹湖考（上）〉。《交大友聲雜誌社》，6 月 13 日，連結網址：<https://alumni-voice.nctu.edu.tw/?p=3874>。

11 秘書處（2023）〈清華校友群策群力，成功湖風華再現〉。《首頁故事》，8 月 29 日，連結網址：<https://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1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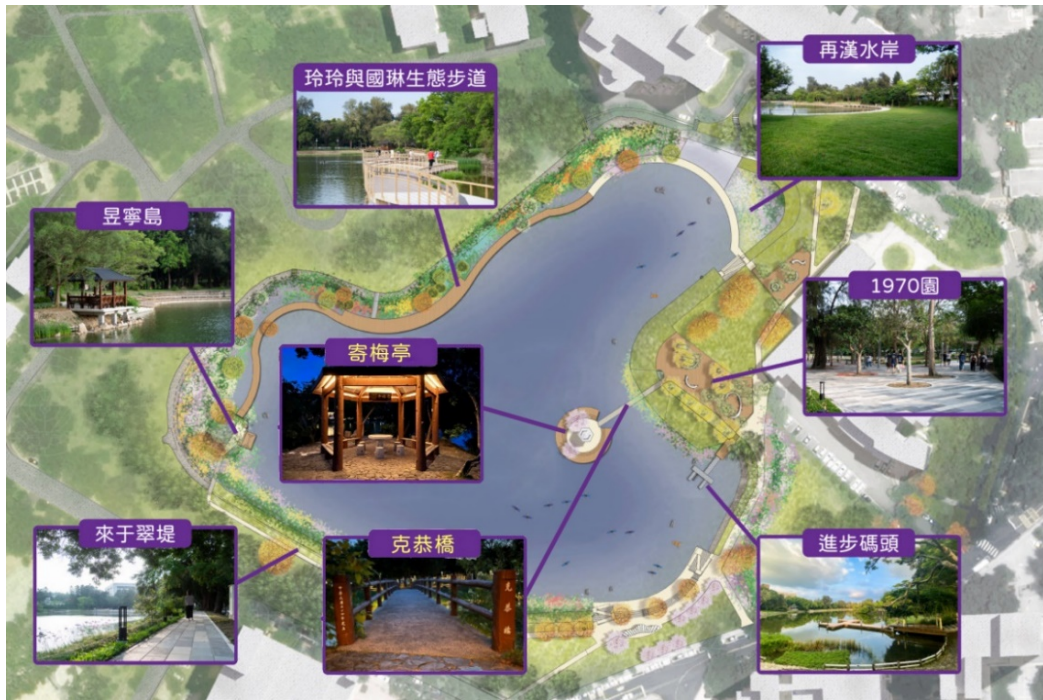


圖 4 清大成功湖畔新建設施（白字標示為新建，黃色為舊有設施）（資料來源：重繪自國立清華大學）

## （二）校湖的權利領域：校湖的近用與邊界互動

前一節裡，本文論道晚近的大學校園呈現了「公園化」、「社區化」趨勢（夏鑄九，2016），校園的公共性與開放性提高，因而有越來越多的市民前來近用（access），從而令校園成了與公園幾乎無異之社會性基礎設施。而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核心關切，旨在於其實體環境能否成為支持公眾生活的基石，且主要取決於人們近用空間的友善程度，涵括開放、包容、公共、親近、民主等向度（Klinenberg, 2021）。

延續前開台大醉月湖的案例。伴隨校園的公園化，校內的醉月湖等開放空間成為了台北都會市民的「補償性綠地」與「都會公園」（夏鑄九，2016）。此一趨勢從昔日的報導軌跡可見一斑。1980年代，當時的台大校園已對外開放，惟醉月湖尚未廣為人知，仍為校內景點。著名畫家梁丹丰於投書中回憶道，過去其曾帶著學生至台大寫生，偶然經校內教師的引薦，始而得知醉月湖的存在。<sup>12</sup>90年代後，醉月湖則搖身變成台北的著名景點，吸引不少校外市民入園造訪。作家陳俊

12 梁丹丰（1986/8/23）〈寶島素描：臺大醉月湖〉。《中央日報》，版 11。



志回憶道，兒時會將醉月湖把作冒險遊樂場，並以在醉月湖旁的草叢戲弄情侶為樂<sup>13</sup>；以及，也有的市民在報章分享道，平時上班前會前至醉月湖畔從事運動、欣賞晨景和回味學生生活，浸淫其中氛圍。<sup>14</sup>

就近用空間的角度，上述現象例子呈顯出校園和都市空間之間的使用邊界消融，呈顯為一種「去領域化」之態勢。此外，人們將校園湖區挪作公園使用之情形，大抵呼應 Rivlin (2006) 所謂的「尋獲型空間」(found space) 觀點：縱然湖區的本質為校園，不具公園等正規公共空間之地位，然卻猶如額外溢出的 (spillover) 公共空間，彌補了前者的功能不彰與空間不足。溯及權利之探討，這類近用的觀念與實踐也接近於 Lefebvre (1996) 「都市權」(right to the city) 觀念，強調人們經由「參與」而非「佔用」的方式來涉入空間，並隱含以空間的「使用」來取代「所有」之邏輯。

不過，校園湖區空間之公共、開放程度，部分則取決於校方對於近用空間權利之態度，牽涉其治學理念與對時勢的體認。以交大的竹湖為例，在 1979 年到 90 年代的這段期間，湖的使用者主要為校內師生，並用於從事水上和湖畔一帶之教學與遊憩項目，如釣魚、操帆等。1990 年代初，竹湖迎來了首次大規模的景觀整治，校方有意將湖畔一帶打造成「新竹地區精緻花園」。時任校長鄧啟福曾表示道，有感交大不夠開放和關懷周遭的新竹地區，認為學校除了專精於研究，也「應負起一流大學的社會責任」，並與所在的新竹地區「緊密結合，共享資源」。亦即，竹湖的整治旨在塑造一處可供師生休息，乃至作為新竹地區民眾調劑身心的場所；以及，透過竹湖一帶的開放空間和遊憩項目之營造，以搭建交大和新竹市民之間的溝通橋樑。<sup>15</sup>

再者，當今的大學校園趨向開放，校內師生職員和一般市民在近用湖畔空間上無異，校園和公園之間貌似無差別。然事實上，政府目前對於公園的管理是以訂定條例去規範，甚至是相關罰則去約束使用者的相關行為。儘管校園的治理與近用方式已趨近於「社區化」、「公園化」，大學校園對於校湖的使用則多仍是以告示牌來規範之，且通常能夠申請使用的對象亦是以校園師生為主。

---

13 陳俊志 (2010/5/28)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中國時報》，版 E4。

14 玉青 (2001/11/24) 〈健康你我他：浪漫散步椰林道〉。《聯合報》，版 34。

15 陳愛珠 (1996/3/7) 〈開放校區，提供資源與社區民眾共享：交大整治竹湖，校園宛如花園〉。《中國時報》，版 13。

以清大成功湖為例，其湖畔告示牌即明令道，從上水域活動，如獨木舟、橡皮艇、輕艇、水上腳踏車等載具，須為本校核准使用者，無飲酒且無患心臟病、高血壓等症狀，及需配有合格救生員在場外，並落實遵守學校訂定的成功湖使用管理要點。就權利和領域的角度，市民乃至非相關專業的師生職員，並不具近用水域遊憩項目之權利，僅能使用湖畔一帶空間與設施。其次，湖畔一帶尚有禮堂和社團辦公室，又僅有校內師生可以使用，市民實際能近用的空間再少些。意即，使用者能使用的空間範圍取決於其能力與資格。

此外，本文也留意到，過去這些校湖裡，有的如興大、清大、交大等，校內師生可以僅消付費，便能從事釣魚和划船等水上活動。例如，中興湖曾經開放讓人付費釣魚，一旁還設養魚工讀生歇息的工寮（蔡宗憲，2019: 48）；交大福利社曾經販售過釣魚證，學生僅需花 600 元，即可於竹湖垂釣一年（夏筱明，2005）；清大則曾販售過一張 7 元的船票，有的校友會租來划船到成功湖中央賞星，<sup>16</sup>不過後來校方的安全考量而停止開放（許明德，2021: 110），或是如前述提及有限度的開放民眾使用，對於安全因應有更高的要求。

綜上所述，從領域的角度來看，竹湖一帶校地的使用邊界係經重新界定和確認的，即明確開放給校外人士使用後，此處的使用者不再只為校內使用者所近用。而此一現象乍看為一種「去領域化」之過程，然從校方的政策調整卻未必能遽下結論。套借黃書緯（2021）觀點，這種治理尺度範圍之更迭關涉到治理如何從既有的邊界，「轉型成為與外界網絡連結的『再領域化』」（頁 65）。這同時也意味了去領域化之際還可能伴隨著空間的再領域化，以調整及穩固其邊界與意義。

不過，相較爭論於「去領域化」或「再領域化」之界定，本文傾向視兩者為一組持續互動之張力關係。延續湖岸禁止告示的例子，本研究實際造訪五座校湖，發現民眾並未如實遵守相關規定。像是禁止餵食動物的牌子附近，依舊可見有市民向鳥禽投食飼料。這一類現象事例尤以「池太太事件」出名。據 2002 年報導，一化名「池太太」市民退休後，經常帶飼料前往醉月湖畔餵食流浪犬和野鳥。因影響校園環境，一度招徠校方的關切，以「嚴重影響到校園衛生及安全」為由，要求其將所有的鴨子帶回。此事在當時的學生之間曾引起正反議論，「有的人覺

---

16 洪美秀（2021）〈清大校慶開放成功湖划船，校友感動：終於體驗到了〉。《自由時報》，4 月 23 日，連結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509442>。

得醉月湖沒有鴨子，他們就不會去了；但也有學生認為，民眾不該將醉月湖當作私人養殖場」。<sup>17</sup>

當然，除了不當使用校湖而被動地撼搖校方的治理神經，令校湖的權利爭論現形，那麼有無「主動出擊」之積極事例？以交大竹湖為例，2009年，一名男童不慎於竹湖落水溺死。在男童母親察覺失蹤的第一時間，交大學生協助其轉告尋人啟事於交大的 BBS 版上，校內多名學生見狀紛紛加入尋人行列。事發到尋獲的數日，校園能見多組學生結伴搜索和發放尋人傳單。縱使結果以男童罹難作收，不過參與當時事件的學生卻認為行動替交大帶來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令學生感到「整個交大的人都團結在一起了」。<sup>18</sup>從基礎設施研究的觀點，若說設施的失當指向了人身安危等意外，令人們捲入了因事故而起的動員行列，不啻形成了接近於李蔚、王志弘（2021）所謂「基礎設施的社區化」之效果，發揮了化設施危機為轉機之社群動員與凝聚的作用。

## 五、校湖的地方生產與建構

前一節裡，本文論及校湖的命名不僅展現其權力之決策面，也提示了命名的權力也包括那些攫獲人們歸屬與認同、潛移默化之象徵作用過程，屬於權力的文化面。誠如 Larkin（2013）指陳，基礎設施的詩學創造了「宛若」（as if）的政治（頁 335），旨在讓人民接受命名等再現製造之「社會事實」（social fact），以獲取對設施之信任。簡言之，校湖既可以是支配的政治，也可以是再現的政治；而後者牽涉了基礎設施文化層面之探討。不過，如同本文在分析框架部分的主張，若將基礎設施的文化面探討定錨於主體對設施的期望——國家之於其光榮或焦慮（Larkin, 2013；王志弘、黃若慈，2017）——顯些侷限。應此，本文主張擴大主體指涉的對象範圍，尤其賦予民眾具能動性之主體位置；以及，將「地方感」等納為主體的感受範疇。以下，本文同樣延續規劃者與使用者這組視角，並將對校湖的美學關注轉移至二者如何促成地方意義之生產與建構關係。

---

17 陳子鈺（2002/4/13）〈台大趕鴨：鴨不走就拿來「教學」〉。《聯合晚報》，版 4。

18 許庭瑜（2009）〈協尋男童，交大學生總動員〉。《喀報》，11月21日。連結網址：<https://ir.ntu.edu.tw/bitstream/11536/34630/1/1946.pdf?fbclid=IwAR2CfXkO-zwl1X9-Y-xP-e1fWOnAn6BrHagTduGb57rvITouWaK14sQKx8c>。

## (一) 校湖的地方生產：銘刻、移植與感化

### 1. 命名的象徵與藝術

順著命名一題，本文贊同 Cresswell (2006) 觀點，「命名是賦予地方意義的方是之一」，並且「與建造地景的物質過程一樣重要」(頁 155)。從前一節關於校湖之命名由來，可以發現到其名有的關聯於紀念特定之對象。例如，交大竹湖是為了紀念復校校長凌鴻勛，取其字竹銘之意，甚至於湖畔一帶建有「竹湖」字樣的竹節窗雕塑，及於東畔規劃種有三十種竹子之「百竹園」，在在強化了校湖與竹之間的意象關聯(陳建安，2018)。清大成功湖的諸項設施除了紀念校長，也包括到功成名就的校友。不過成功湖本身的命名並無關乎紀念特定個人，倒是反映了特定的時代背景。命名者朱樹恭回憶道，湖落成之際，當時的熱門報導為聯合國於美國紐約開會，其地點就位在成功湖(Lake Success)，於是借名冠之(陳力俊，2020: 162)。

同樣地，興大的中興湖亦為時代下產物。它不單是攬用校名，其中華民國「秋海棠」地圖之平面形制透露了「復興中華」之意，並呼應過去國民政府宣揚收復中華民國疆土之時代背景。從符號學的角度，校湖的命名與配合之意象營造無不起了「隱喻」(metaphor) 或「轉喻」(metonymy) 之作用，寓含所要傳達紀念之意義或以局部特徵與表象代以指涉(Urry & Larsen, 2016: 41)。

相較於由上而下的校湖(即便看似「折衷」的交大竹湖，其湖名的最終決策權實際仍掌握於校方行政層)，由下而上命名的台大醉月湖則顯得扞格不入，既無關乎特定之紀念對象，亦取自校名。不過，Low (2017) 關於空間的社會生產說明則提醒我們，應留意到命名背後的「政治經濟脈絡」。醉月湖的命名人蘇元良回憶道(2009)，其名發軔於當時代的政治氛圍：1960、70 年代，適值當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外交困境，激起不少台大學生投入到愛國運動。然運動卻在發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後，遭遇校方和情治單位介入和整肅，一夕噤聲。亦言之，醉月湖一名某種程度旨在呼應當時學生們的心境，具緩和當時的肅殺氛圍及「適度疏導學生超溢的熱情」之象徵用意(頁 37)。此外，其命名背後亦暗含了對校方命名之美學邏輯預設的對抗，認為醉月湖的浪漫之意更勝「成功」等具勵志意涵之名稱(頁 36)。

### 2. 自明性與認同之再現場域

除了校湖的命名與象徵，其形制也是校方施展其特定意識形態之場域。一如前述提及中興湖的秋海棠版圖，亞洲大學的太極湖、國立臺北大學的心湖造型同樣為精心之作，並關涉校湖的象徵意涵與生產。前者外觀為一太極湖輪廓，湖水佔據一邊，湖畔綠地則另分一側，合為陰陽外形。至於後者，心湖的創建者暨國立臺北大學創校校長李建興嘗言道，心湖係由下述三種表徵意義構成：（一）校園的中心；（二）湖呈圓形狀，象徵「活水進出」；（三）體現「禪心」，具有「精神意象有自然崇高淨心正念的意涵」。此一構想亦照應了李建興個人的宗教信仰。身為虔誠佛教徒的他，為此不僅請來聖嚴法師為湖命名，更於湖畔一帶設置諸個具禪宗意象之石刻造景，體現其個人價值觀。爾後，聖嚴法師的辭世，心湖亦成為了對逝者的追思之物。<sup>19</sup>

類似奠基於意識形態之展演工程，興大中興湖更勝一籌。除了前述中華民國疆域圖之湖體造型，其也高度運用中國地理與華式園林等意象元素：湖心置有一島，名曰「蘭州島」，正好對映了秋海棠地圖中央的蘭州市；湖岸一帶則可見各式園林山石，有的如湖東北方的「中興湖石刻」，正面題有中興湖字樣，背面則印著中華民國地圖，並鑲著「還我山河」之漆金刻字；湖的東南方及南方尚分別設「台灣」、「海南」二島水池，依傍於湖畔；湖畔的西南地帶則隆起高坡土丘，其土堆來自鑿湖的土堆，象徵性堆成喜馬拉雅山（林富士編，2009: 502-3），使遊人如臨其地，並得以居高俯瞰整座湖區（呈圖 5）。就目的而言，中興湖區的整體景觀營造旨在讓學生透過「面對國土形狀之湖水」，從中「啟發報效國家，服務社會之志節」（張嘉成，1990: 313）。

通過上述案例，校湖實則關涉到校園自明性（identity）之塑造。自明性意指可供辨識、有別於其他領域之空間特質（或說「獨特性」），並體現領域擁有者的自我認同，具有「為人辨識」與「自我辨識」之雙層意義（陳念炫，1997；陳建宏，2009）。二座校湖的形制與象徵吸納了宗教與國族之意象元素與符號，令其成為明辨獨特之校園地標；以及，它們也投射了規劃者的宗教與國族認同，透過湖區園景之意象元素與安排使其具象化。

---

19 李建興（2009）〈心湖勒石：追思聖嚴師父〉。《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3月9日，連結網址：<https://www.npf.org.tw/3/5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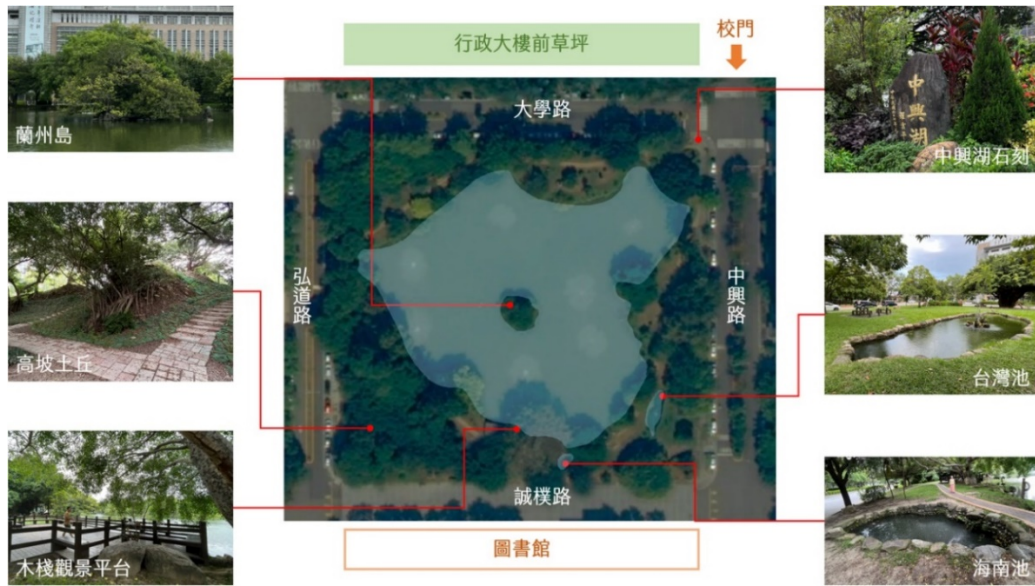


圖 5 中興湖景觀一覽（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進一步地，自明性既關乎於認同，也含有代表性之意，意指可代表特定範圍之特質或元素（陳建宏，2009）。之於校湖，其意象則是化身為校園的代表物與象徵符碼，並具象化於其它的媒介載體。以台大為例，校內的紀念商品裡，便曾將醉月湖的意象融入至紀念馬克杯等，成為一具高度象徵價值之商品，並指向人們以其滿足認同渴望之「拜物教」(fetishism) 性格。另外，清大、交大兩校合辦多年的運動盛事梅竹賽裡，各有代表的吉祥物。其中，交大的吉祥物狐狸據聞是取「竹湖」諧音（通「竹狐」）而來，並成為交大校徽以外之認同表徵（楊凱傑、陳彥傑，2023）。綜合來看，以上的例子也顯示道，校湖的自明性轉換於認同、獨特性與代表性等層次，甚至可能脫逸出原先的指涉，如乘著認同的商品化或諧音意再現一番。

就地理的尺度，Cresswell（2006）提醒道，除了市、鎮、鄰、里這類小尺度的地方，也需留意國族國家等大尺度（頁 157）。因此，除了將校湖連結上校園的尺度，一如前述興大的例子，其也可能展現於國家與國族之認同尺度。照見中興湖的建成時代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1966 至 1976 年）浪潮，厲行一系列反中華傳統與思想改造。與此同時，台灣的國民政府則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示分庭抗禮，並以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復興以顯示其於文化乃至暗示政權上之正統性（洪貫銘，2022）。

換言之，這類的意識型態經常展現於公共空間，中興湖畔的中國地圖和園林造景亦不例外。套借王志弘(1996)觀點，這一類的營造係為中華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空間建構，旨在將這些中式元素「體現於空間的形式與意義裡」，從而「在視覺與身體上教化出符合此一國族想像之行為規範的『國民』」(頁 202)。而中興湖教化之對象則指向大學內部的師生群體，也印證著 Agnew 的觀點，國族尺度的地方感可以同其他尺度(如校園)並存(引自 Cresswell, 2006: 159)。

### 3. 被塑造的感官體驗

Larkin (2013) 論及基礎設施的詩學時也提醒道，除了檢視基礎設施的表徵意涵，亦須留意其創造的感官體驗係如何滲透於日常之中。延續前述自明性之討論，校湖作為校園的地標，高度體現了校園的在地自明性。其中，有的校湖尚搭配如解說牌、校園導覽手冊等文本，除了特別彰顯校湖之於校園整體景觀之重要地位，也引導著民眾對校湖之感官體驗。以交大竹湖為例，其湖畔的解說牌內容中便將竹湖納入校園的景觀地圖，並囊括了校內 14 景中的 3 景，分別為「竹湖晨風」、「竹園映亭」和「曲道夾蔭」，<sup>20</sup>分別座落在竹湖北端的木棧平台、南端的亭子「振吾亭」，以及圍繞湖畔半圈、樹木交織如綠色隧道般的環校車道。無論是哪一個解說牌，說明多強調景觀帶予人的感官體驗，像是「竹湖晨風」一景的解說牌如此寫道：

早晨的竹湖，朝陽在柳樹間穿梭，清風徐來，人們徜徉其間，遙望鐘樓，一般俗人都會想到「一日之計在於晨」，更何況在最高學府求學的莘莘學子。晨風也是一種鳥，這種鳥是早上才會啾啾的鳴叫。湖光襯著鳥鳴加上湖邊的柳樹，曲水，花園是校園一大勝景。

從這份景觀解說可以探見，此景良好的體驗時刻為早晨，而且人們還可以通過置身湖畔平台，環視著湖畔和周遭的樹林和人社一館的鐘樓。尤其後者進一步地襯托出「一日之計」的晨景意象，使早晨時刻和起鳴鐘響之印象聯繫一塊。

從景觀的角度，解說牌和平台的設置具引導感官體驗之功能，即替受眾設定了特定的觀看視角和體驗方向。具言之，受眾的凝視在此被引導從湖上平台，由近景的湖畔放眼至遠景的鐘樓；而兩者分別代表了校園北區裡高程特低與特高之

20 其他十一景同樣為四字命名，包括「綠掩重樓」、「松林立翠」、「玉樹向榮」、「思源春曉」、「風亭九思」、「荷塘月色」、「南台遠眺」、「率意通衢」、「西亭笑語」、「康莊迎曦」、「緣慧潤生」。

地標，並經由該空間與視覺的安排，得以於視覺上獲致聚焦與連結（呈圖 6）。此外，解說內容也引導了觀者的凝視時間，將湖景定位為適宜早晨體驗之景觀所在。最後，此景的描述不僅呈現於解說牌裡，同樣的描述亦現身於校方的官網和出版的導覽手冊《交大的力與美》之中，在在強化了官方的體驗設定。一如 Urry 與 Larsen（2016）對觀光客之凝視現象的觀察，「我們並非純然在『看』事物」，因為「我們看見的一切事物在某種程度上被建構成符號」。校湖的景觀凝視與導覽無疑是高度建構之符號場域。



圖 6 竹湖與人社一館鐘樓（右方白色建物）（資料來源：翻攝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發展館）

這類的景觀體驗引導也見於其他校湖案例。例如，台大透過校內古圳道的水路軌跡，將校園內的醉月湖和瑠公圳生態池二個地標聯繫了起來。遊人可以經由告示牌的引導，循著這條水路到達二個水景。<sup>21</sup>興大中興湖則是通過動線的安排，利用湖岸設置的環湖步道，引導遊人沿著中華民國的疆域輪廓環繞一圈，並從沿路的景觀中意會和聯想身在的地理特色。

---

21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台灣大學瑠公圳舊址復原及小椰林道段渠道景觀工程規畫構想》。連結網址：<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file/10344/27458/eaf50364-610f-4645-8e71-d99cc9b406ba.pdf>。



## (二) 校湖的地方建構：感識、依戀與想望

細究前節談論諸個由校方上而下的校湖空間美學營造，本文留意到部分美學內涵發軔於校外的元素，無論是移植中國版圖和園林語彙塑造湖畔景觀，或者挪借名人形象來為湖加持，和自身學校的文化關聯較為薄弱。相反地，本文發現在使用者一端，無論是校內師生、職員抑或校外的市民，經由個人的體驗與經驗，投射自身的詮釋、回憶和想像，則形成了與校方截然不同之校湖的再現文本。誠如 Low (2017) 提醒，地方的意義除了來自官方的生產，同時也應探見促成地方那「人們的社會互動、記憶、感受、想像和日常使用（或者缺乏它們）而發生的轉變與爭論」（頁 68）。

### 1. 感官的體驗／經驗與傳統

Larkin (2013) 闡述基礎設施的詩學時論道，除了關注主體的表徵再現，也需覺察其創造的感官體驗／經驗 (experience)。本文留意到，相較於將校湖視作為視覺性的地標存在，校湖作為人們使用的設施物則是感官多元且豐富的所在。這一類的使用體驗和經驗主要通過人們於校湖從事之水上及湖畔的遊憩活動開展而來，包括划船、釣魚、游泳、寫生、散步、野餐、賞鳥、餵食水禽或流浪犬隻，以及其獨有之「丟湖」或「跳湖」慶祝現象，項目多元 (楊凱傑、陳彥傑，2023)。當中，有的項目與公園無異；有時，也像公園般吸引到外部的市民群體，近便前來尋求以上的戶外活動體驗。這些再日常不過的活動也呈顯出，除了 Larkin (2013) 和王志弘、黃若慈 (2018) 關乎基礎設施帶予主體之國族的優越與焦慮，另可能存在其它的情狀向度。

不過這些項目裡，並非每一項皆是常態性活動；以及，有的甚至僅發生於過去的某段時期。以釣魚和划船現象為例，不同於今次，在昔日有湖的校園裡稱不上罕見。甚至，它一度還是校園的特定事業，如同前文提及清大、交大、興大皆曾有過釣魚和划船收費之紀錄。另外，在某些學校裡，校湖也作為划船的教學場所，或用以舉辦例行性賽事。以台大醉月湖為例，1973 年至 90 年代，其曾經作為畢業船賽的場地，也是部分校友的校友的畢業回憶與傳統。其中，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是畢業生方享有特權划船上湖中央的湖心亭，以象徵求學艱辛終可畢業 (臺大校史館，2011: 66-7)。

眾活動項目裡，通過「跳湖」或「丟湖」動作以作慶祝者，可能是校湖獨有之文化。關於這類活動出現的確切時間不可考。筆者曾在臉書社團「NTU 台大學生交流版」裡收到一名畢業校友的回饋。對方表示道：過去的畢業船賽主要係由羅浮群社承辦，作為社員的他亦曾擔任 1986 年畢業船賽的救生員。當年活動結束後，社團成員會依照慣例，將卸任前的幹部丟進湖裡；而他也被推入過湖裡，隨後以抬頭捷泳游上湖心亭。從該名校友提供的線索，本文發現類似的活動於 1986 年前便已存在；而台大醉月湖則建成於 1973 年（首屆畢業船賽亦為同一年），推測該活動應是在這些年間發展的。另外，這一類投湖慶祝的活動，背後的慶祝目的與理由也不盡相同，像是有的學生是為了兌現承諾，如發願鍾意的球隊贏得賽事，是以跳湖來還願。而此類的行為亦引來校方關切，如申明醉月湖禁止游泳之安全規定；而此舉亦屬使用行為偏離與挑動校方治理之例證。



圖 7 醉月湖畢業船賽（資料來源：翻攝自《國立臺灣大學六十二學年度畢業同學紀念冊》）

另外，即使是同一座水域，也可能因為使用群體的差異，令類似的活動而有不同的意義解讀，乃至對其回憶和象徵意義疊覆一塊。以成大成功湖為例，據聞跳湖的儀式最早發軔於成大的橄欖球隊。球員會在比賽結束後，因全身沾滿泥污，於是索性投入成功湖來洗淨身軀。爾後，這項「洗禮」活動則蔓延開來，成為校

內社團和學系的傳統（蔡侑樺，2014）。不過對於外文系學生而言，投湖則象徵著畢業，即透過將畢業生推入成功湖此舉以完成此項通過儀式。

一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畢業生紛紛被同學推進成功湖，也有劇烈抵抗，抵死不從，但最後仍被眾人抬起，丟入湖中者。此時成功湖畔傳來此起彼落的哀嚎聲、求饒聲、和「噗通」「噗通」的落水聲。只見一個個濕淋淋的水人兒，面容悽慘地從湖中站立起來，岸上同學紛紛大聲歡呼。更有原本在湖邊竄逃的同學，最後索性以壯烈的姿態跳進湖裡，以殉道者的姿態完成成大外文系的畢業儀式（王偉勇編，2010: 30）。

從外文系的例子可以探見感官的體驗除了變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憶，亦有可能從非常態、非正式的活動，轉化為例行性的項目與集體記憶。當然，此項傳統得以延續，除了有賴學生間的傳承，湖的深度也確保了此事得以被「安全」發生。成功湖水深約為 1 至 1.5 公尺之間，大部分的人均可站立於湖中，故未曾像其他湖有重大傷亡事件（蔡侑樺，2014）。不過現今這項傳統可能有退燒趨勢，除了學生安全意識提高，校方亦立牌警告，禁止此項傳統。<sup>22</sup>

## 2. 歸屬與認同的泉源所在

接著，從上述跳湖的現象裡，校湖既是感官的體驗之地，亦為經驗的見證所在；而這部分又牽涉到校湖與個人之間的回憶層次，並散見於畢業紀念冊、校友的回憶錄等文本。以交大竹湖為例，1983 年迄今的畢業紀念冊裡，皆收錄了竹湖的影像。其中，有的還於照片旁題上幾句詩字。例如，1997 年的畢業紀念冊如此描繪竹湖：「你把湖水一杓杓舀進那日的藍天裡／……我會拾起湖邊小徑上你的足印／把它押進那日我們專屬標籤裡／永遠回憶」。詩詞在此挪借竹湖映人眼簾的藍天、湖水、湖邊小徑等元素以作回憶的提喻；以及，將之描繪為秘密場所，過往的回憶藏身於當屆畢業生之集體記憶之中。相較前述校園解說牌裡昭明的竹湖形象，其在學生的印象裡則是私密與思念的歸屬所在。

進一步地，對於校湖的歸屬還可能進展到認同的層次。「懷念那年夏天，」清大現行的校歌裡如此譜道：「清華園中你的身影，是成功湖畔的一朵美麗……。」此曲早先為情歌，名曰〈清大情歌〉，由清大電機系校友羅亦耀於大四的寒假寫

---

22 徐慧珠等（2019）〈畢業跳湖、賭注泳渡，校園湖泊潛藏危機〉。《TVBS 新聞網》，6 月 11 日，連結網址：<https://news.tvbs.com.tw/local/1147613>。

下，以歌曲中的「你」代指鍾愛的清大康輔社，並表達對其離情感傷；而成功湖則是傳喚離別情景的認同要素，並作清大校園之提喻。後來此曲傳唱於清大各類營隊與晚會等活動，甚至成為「民間版校歌」。羅亦耀畢業後，延續此曲創作了〈坐在清華看星星〉、〈相思湖的水〉，合為清華情歌三部曲。<sup>23</sup>其中，〈相思湖的水〉一曲同樣運用了清大校湖「相思湖」為題材，將其聯繫上年少懷愁、作夢等表徵。

綜合上述現象案例，它們分別代表了校湖從體驗／經驗、傳統、歸屬、認同之層次，同時也是 Tuan (1998) 論述空間轉換為地方之過程或地方依附的程度。具言之，個人對於陌生的空間會借助對空間的感覺、識覺與觀念來產生熟悉感。隨後，對空間的熟悉與親切感進一步地也令空間成為固著、滯留、日常及反復操演 (performance) 之所在，從而構成了所謂的地方。

當然，校湖作為一種地方的存在，既指向與人們之間的情感連結，也可能指向之間的斷裂。例如，校友回憶錄《南方歌未央》裡，成大校友既異議性社團西格瑪社成員王明蘊回憶道，原初的成大成功湖僅是蘆葦、荷葉、無燈火之地方，並在他心裡留下了「純粹卻充滿野趣」之草塘印象，也是其對西格瑪社不羈形象之投射。這般景也對比於後來成功湖那過度雕琢的園林景觀。「非常糟糕，」王明蘊對於今日的成功湖批評與失望道：「絕對應該整個把它拔掉。那太多，一點意象都沒有，太滿了」（引自王健文、張幸真，2011: 109）。此一例子道出了校湖可能因著景觀的更迭，致使場所與個人回憶之間的地方感斷裂。亦即地方性 (locality) 的消逝，使得人們對故土 (校湖) 的感情失去依託。而此一情景亦呼應 Cresswell (2006) 所謂的「地方錯置」(anachorism)，即地方性的斷裂致使個人產生置身錯誤地方及「不得其所」(out-of-place) 之無歸屬感 (頁 163-5)。

### 3. 想像鬼魅在校湖縈繞

最後，校湖的文化意義也關乎於地方想像層面的探討，前述提及交大畢業紀念冊中的竹湖題字即是一例。當然，除了根據校湖的景觀與回憶而產生的場景想像，還有一種類型指向由既有事物衍生之想像敘事，即校湖的鬼故事。台大醉月湖的鬼故事便是以醉月湖作為場景，發軔於其「斷橋」和「孤亭」(湖心亭) 之意象，並在學生之間盛傳著。據傳言，此處曾有一位女學生因苦等熱戀但四處拈

---

23 潘國正、李欣怡 (2005/10/26) 〈情歌成校歌，清大新鮮人必唱〉。《中國時報》，版 C4。

花惹草的學長未果，經望湖生悲後，投水殉情。此後，每逢深夜，殉情女子鬼魂便現身湖畔，徘徊不去，並逢人問時辰。若回答的時辰超過女子生前和熱戀學長相約的時間，女鬼便將回答的人拖至湖底。同一則故事另有其他衍生的版本。如有一說醉湖的斷橋是被悔不當初的學長經每日哭喊搥打，給一寸寸踏斷的；或因靈異事件不斷，致使校方拆除涼亭的通橋，成了今湖心亭的斷橋景觀。<sup>2425</sup>縱使湖心亭的斷橋設計自始迄今無從變過（臺大校史館，2011: 66-7），然亭子的截斷階梯景像仍令不知情的觀者產生上述斷橋聯想。

交大竹湖的鬼故事同樣反映著湖水與溺斃之間的死亡聯想。相傳，昔日曾有一名帆船社成員於颱風天至竹湖玩帆失蹤，校方後來將湖水放光，發現該名學生倒插於竹湖的爛泥巴裡。離奇的是，事發之後，罹難者生前在八舍四樓睡的那張床鋪自此不停地滲出水來。曾經有學校教官不信邪，在該寢室住了一晚，隔天出來後卻什麼也不願意說，並將寢室封鎖起來。據考察，此故事的藍本可能發軔於 1981 年，時交大帆船社副社長因駕駛帆船不慎，溺斃竹湖之憾事。<sup>26</sup>

簡言之，上述二則故事雖為想像的敘事，然這類敘事因奠基於部分的事實基礎上，無論是斷橋與孤亭予人的景觀錯覺，或是自真實溺斃事件而生，從而令其增添幾分可信並傳述於後人。另外，鬼魅其縈繞（haunting）不去的形象亦呼應了地方寓含之「固著」隱喻。然就哲學家 Derrida 的觀點，這一類的鬼魅敘事實則為「延異」（différance）般存在。意即其意義雖然胎生自真實世界，卻「溢出現實與物質框架的記憶、時間性、生命痕億」（引自黃涵榆，2018: 225），並以「魂在」（hauntology）式之敘事文本再現於校湖的象徵場域。

## 六、結語

Klinenberg（2021）論及社會性基礎設施一概念寓含之空間性質，即作為支持性的社會空間（通常也是公眾生活的空間），使本文注意到校湖同樣可從空間

24 安康魚（2010/1/29）〈醉月湖的白衣女〉。《聯合報》，版 D4。

25 生活中心（2017）〈台大死亡地圖！情殺、吊死 20 年 10 命...傳殉情學姊帶走學生〉。《ETtoday 新聞雲》，10 月 21 日。連結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021/1035713.htm#ixzz7uW301ceb>。

26 楊凱傑（2023）〈交大竹湖考（下）〉。《交大友聲雜誌社》，7 月 3 日，連結網址：<https://alumni-voice.nctu.edu.tw/?p=3949>。

的向度切論檢視。之於本文，校湖被呈現為「領域」與「地方」二種意義場域（也是分析的單元），並分別開展於其政治與文化層面之意義探索。以下，本文分別就二個面向勾勒其整體意義圖像，再就二者之間的交互關係做進一步地說明。

就政治面，通常代表規劃者的「權力」與代表使用者的「權利」，作用於校湖領域這個介面分別呈現為「劃界」與「跨界」二種相互角力的力量，並蘊含了主體對領域的支配與偏離之互動邏輯。它們對校湖這個領域促成各式邊界互動，包括到領域化、去領域化、再領域化等邊界的更迭，像是邊界範圍的游移、穩固的程度等。至於文化面，校湖的文化意涵同樣發軔於代表「地方的社會生產」的規劃者與代表「地方的社會建構」的使用者。它們再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地方形象，既並陳也對比著：在生產的一端，規劃者為了展演校湖的自明性，於是其呈顯為相對高度同一性且有明確美學規範的地方；至於建構的一端，則是由多元使用者塑造的地方，其中的地方意義相對異質，並允許複數體驗、詮釋與敘事的意義在此疊覆。

綜合二個面向，本文進一步指陳校湖的政治與文化二個面向之間的關係，主要有二點：（一）兩者不僅合為觀點的一體兩面，且（二）就實質的層面上，它們也是建成校湖，或者從基礎設施研究的論點，扮演著提供校湖得以運行與依存之「背景」支持。第一點的部分，重申前述分析框架所言，文化面的探索側重於對校湖的「內容本身的『成分』」，包括檢視與校湖的象徵、美學有關之再現探討。至於政治面，檢視的重點則圍繞在促成這些內容得以實現之「推進過程」。直言之，即這樣的內容係經由哪些實踐的過程方而成為現今的校園湖景。

第二點，基礎設施研究強調基礎設施「順利運轉」背後之脆弱性，尤其表現於毀損、故障頻傳，崩毀、裂解之時刻，從而促使我們留意基礎設施運轉所依存的「基礎」／背景及其所在（林文玲，2017: 2-3）。不過在本文的探討裡，校湖作為一種設施的存在之重點並不在於它的失靈及其後續反應，反倒指向意識形態與象徵符號的生產與建構或是治理的空間化。不過，本文認為基礎設施的背景意義在校湖的探討裡仍然關鍵。在此，所謂的背景無那麼關乎校湖是否作為某種特定隱蔽的「基底」（*infra-*），以支撐校園的日常運作。相反地，背景則指向那些政治與文化向度中，令不同行動者取信、配合與支持其存在之主張、條件、價值等理由，如大學校長們對於設置校湖的堅持，又或者台美斷交時代氛圍下的醉月湖命名等。此點誠如王志弘、黃若慈（2018）指陳台北市自來水系統有賴於基礎設施與人民之間的信賴鏈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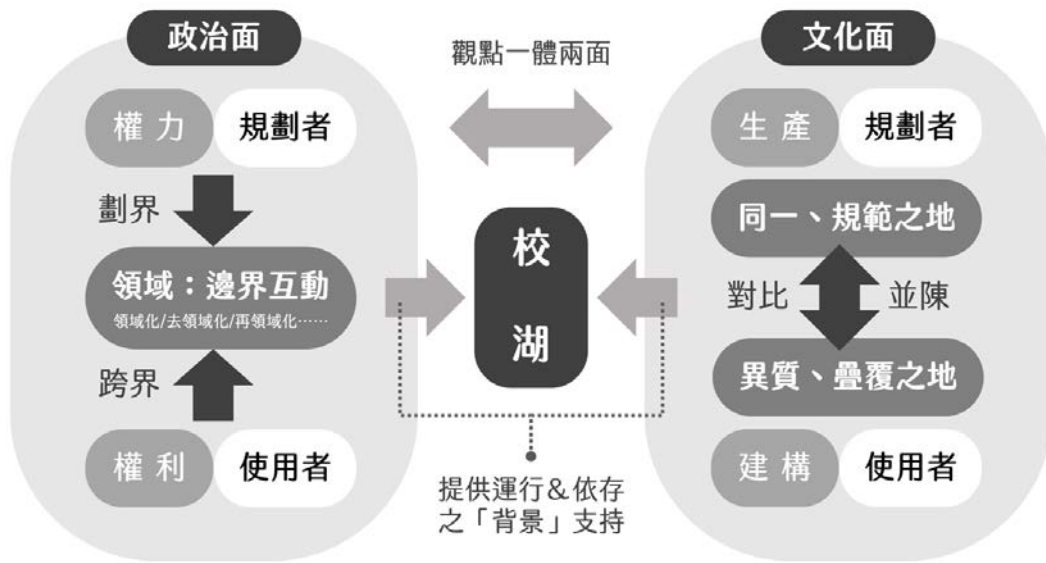


圖 8 校湖政治與文化之意義與辯證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當然，作為一份探索性研究，本文無企圖透過實證研究途徑以印證校湖的特定現象法則或規律，而係旨在提供吾人一套概覽此一現象的分析視角，從中獲致對現象的認識乃至對話，甚至從本份研究中延伸與深化相關議題。特別是在當今氣候變遷劇烈的時代，水資源的循環利用成為重要的議題，也使諸如校湖等校園的開放水域設施及其生態改造成為重要課題。就像前述提到晚近醉月湖的整治，以及其如何聯繫上台北都會區中廣大的瑠公圳水系網絡等例子，在面對校湖以外的水體設施，我們同樣能夠運用本文的分析理路來理解相關現象。

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例，校方於校園和新生南路一段人行道的交接帶設置了一道聯外水景（帶狀生態池或景觀明渠），以之取代部分的圍牆，使其成為兼具生態友善、多樣性的綠色基盤設施，以及學校與市民之間連結介面（林祉嫻，2016）。按本研究關於水體設施的領域見解，聯外水景既是較水泥校牆親和、通透的「邊界」，也因這層邊界特性，促成校園與都市之間的界線高度互動著，並表現於使用群體間（師生、市民）重疊，以及令人們的穿越與駐足（攬景、生態教學等）等情形並存。

最後，作為校湖現象的初步探討，仍有其未竟之處。如本研究尚欠缺對全臺大學校湖整體性的時間圖像，因而難以呈現現象於不同時期之發展與個別現象間的時序關係，僅能就零星個案的歷史與特色來建構與拼湊現象的理解。此外，不足之處尚有在選材方面皆為傳統綜合國立大學，缺乏晚近設立或私立大學的校湖

案例。本研究坦承，囿於資料的來源類型是以檔案為主，檔案的豐富程度有賴於長時間的累積。換句話說，後者學校因成立迄今時間較短，不若前者累積相當可觀之材料，故取材與運用上相對受限。倘若未來有相關研究延續此題，本研究建議將訪談納入研究設計之中，即透過親自訪問相關學校教職員與校友，以完善既有檔案資料之闕漏及多元性不足之問題。

## 謝誌

這份研究發軔於一個起點：我們的大學室友廖亦曦、陳冠維、陳龍田。我們曾屢次在飯後散策於清交大的成功湖、竹湖湖畔，並閒話家常到國家大事；而二湖不僅是這段友誼的見證，亦繫托著我們年輕歲月時的青春年華與日夢壯志。至於研究的終點則是兩位不知其名的審查委員。縱使素昧平生，其對於本研究學術價值的肯定，以及精進研究的修改意見，使本文得以盡善盡美。

當然，在研究路上的兩個端點之間，也存在著我們需要感謝的貴人。第一批貴人是兩位筆者的指導教授賴仕堯、畢恆達、李碧涵，儘管教授們從無參與這份研究，但學位論文期間的指導，替這份研究的資料蒐集、分析與寫作功力奠定深厚的基礎。復次，我們需要感謝的貴人還有凱傑的城鄉所學弟賴彥安，感謝他在某次私下的論文討論會上，提供中興大學中興湖這個精彩案例，不啻為本研究發揮畫龍點睛之效。再者，我們也要感謝在 2023 年社會學年會的研討會場合裡，評論人陳逸淳教授對於本研究的肯定，以及就本研究的分析架構提出可待精進之處，足以向下朝期刊論文改寫邁進。最後，我們亦感謝學報的編輯陳品嘉，多謝他不厭其煩地在兩位筆者、審查委員與學報之間來回奔走，得以令這份研究付梓。

## 參考文獻

- 王小璘、何友鋒（2021）《臺灣園景》。台北：五南。
- 王志弘（1996）〈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95-218。
- 王志弘（2018）《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台北：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志弘、黃若慈 (2017) 〈基礎設施中介的水文領域化：臺北供水治理體制的形成與轉變〉。《社會科學論叢》，11(2)，1-57。
- 王志弘、黃若慈 (2018)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文化研究》，27，159-193。
- 王俊秀 (2023) 《新竹清華園的歷史現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 王振寰 (2014) 〈社會學是什麼？〉。王振寰、瞿海源 (編)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第四版)》 (頁 3-26)。高雄：巨流。
- 王偉勇 (編) (2010) 《成大傳奇》。台北：里仁書局。
- 王健文、張幸真 (2011) 《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王業立 (2021) 《政治學與臺灣政治》。台北：雙葉書廊。
- 王聖允 (2012) 《校園人工湖之水質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應用地球物理與環境科學系碩士論文。
- 江信佑 (2007) 《台大校園雨水再利用課題初探》。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密察等 (編) (2013)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 1928-2012》。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 李宗鴻、彭慧芳 (2017) 〈居民對埤塘之認知分析與再利用方向探討〉。《社區永續觀光研究》，1(2)，1-15。
- 李蔚、王志弘 (2021) 〈社區基礎設施化：新北市新店區花園新城供水爭議〉。《地理研究》，73，1-30。
- 沈宗憲 (2012) 〈林口校區〉。林東泰、林磐聳 (編) 《師大百寶箱》 (頁 63-64)。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 周紓帆、鄭佳昆 (2014) 〈以情境模擬討論地方改變對地方連結之影響：以臺大醉月湖為例〉。《都市與計劃》，41(4)，429-460。
- 林文玲 (2017) 〈基礎設施研究前言〉。《臺灣人類學刊》，15(2)，1-6。
- 林富士 (編) (2009) 《興大實錄：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年校史：1919-2009》。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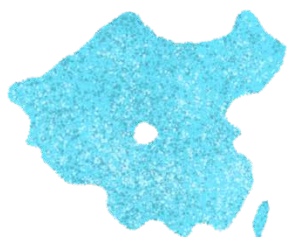
- 林祉嫻(2016)《應用生態設計理念改善臺北科技大學建國南路介面空間之研究》。台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郁云(2009)《水圳、權力、產業的空間轉換：以彰化縣八堡圳二水段為例》。桃園：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侯錦雄、李素馨(2003)《景觀設計元素》。台北：田園城市。
- 洪貫銘(2022)《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裡的政治意涵》。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夏鑄九(2016)《異質地方之營造：公共空間、校園以及社區營造》。台北：唐山。
- 校史編纂小組(編)(2001)《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袁美華、駱尚廉、鄭郁蒨(2016)〈瑠公圳文化資產及復育之生態價值〉。《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28(3)，195-203。
- 康旻杰(2005)《地景敘事體的詮釋與建構》。台北：唐山。
- 張芬芬(2010)〈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在抽象階梯上爬升〉。《初等教育學刊》，35，87-120。
- 張晃維(2009)《水塔：誰的水景？誰的地方？》。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源修、朱世雲、陳中(2010)〈從世界範例看明道蠡澤水系之水岸設計〉。《明道通識論叢》，8，5-32。
- 張嘉成(1990)〈飛躍的九年：羅校長時期回顧片段(民國六十一年八月至七十年七月)〉。編輯委員會(編)《興大七十年》(頁310-313)。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 梁碧峯(2016)《細說東海早期風華》。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
- 許明德(2021)《清華文藝復興》。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 陳力俊(2020)《水清木華：清華的故事》。台北：致出版。
- 陳念炫(1997)《都市街道自明性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台中：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 陳建安(2018)《交大校園散策：老照片現場巡禮路線》。新竹：國立交通大學。

- 陳建宏 (2009) 《都市背景天際線之視覺影響分析——以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為例》。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 陳政斌 (2012) 《以磷的質量平衡解析校園人工湖之營養鹽削減效益》。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應用地球物理與環境科學碩士論文。
- 陳欽忠 (2010) 〈學生心目中的羅雲平校長〉。《興大校友》，20，62-64。
- 陳瓊杉 (1998) 〈公園化、社區化校園：臺中縣龍泉國小〉。《師友月刊》，371，92-94。
- 曾騰光 (2002) 〈實施勞作教育制度的教育功能：以朝陽科技大學之經驗為例〉。《學生輔導》，8，48-59。
- 湯志民 (2006) 《臺灣的學校建築 (二版)》。台北：五南。
- 湯志民 (2014) 《校園規劃新論》。台北：五南。
- 湯志民 (2022) 《學校建築規劃：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
- 黃天久 (2010) 〈我所知道的羅雲平校長兼談校長〉。《興大校友》，20，36-47。
- 黃文誼 (2021) 《基礎設施中介的人水關係：新店溪秀朗橋至碧潭橋段水岸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書緯 (2022) 〈水利邊界：金門供水網絡的形成、困境與邊界實踐〉。《臺灣民主季刊》，19，41-78。
- 黃涵榆 (2018) 〈檔案、記憶、正義：德希達鬼魂學思考〉。蔣伯欣 (編) 《共再生的記憶：重建臺灣藝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225-244)。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
- 楊凱傑、陳彥傑 (2023) 〈學泉遍開：全台大專校院校湖初探〉。《城鄉通訊》，32，62-82。
- 楊維邦編 (2003) 《交大的力與美》。新竹：國立交通大學。
- 臺大校史館 (2011) 《青春·記憶·老臺大：臺大老照片的二十個故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蔡侑樺 (2014) 〈探看成功湖的前世與今生——寫在成功湖改造工程前夕〉。《成大》245，22-27。

- 蔡宗憲 (2019)《共話當年——中興大學與鄰里居民互動的回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 鄧啟福、周湘雲 (2020)《無求常安：鄧啟福口述歷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蕭珖綺 (2021)《通道、觀視與地方：台北市天橋的生產與建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子儀、王志弘 (2021)〈亡者的文化迴響：臺灣爭議性墓葬襲產化的空間政治〉。《地理研究》，73，103-138。
- 薛怡珍、李國忠、賴明洲 (2002)〈台灣地區地景生態學研究的現況與進展〉。《造園學報》，8(1)，1-20。
- 謝明達 (2016)〈第四章：師範大學林口校區〉。洪致文 (編)《看見師大校園》(頁 248-277)。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 蘇元良 (2009)〈臺大醉月湖名考〉。《臺大校友雙月刊》，63，36-37。
- Berke, P. R., Godschalk, D. R., Kaiser, E. J. & Rodriguez, D. A. (2009)《都市土地使用規劃》(薩支平譯)。台北：五南。
- Carse, A. (2017). Keyword infrastructure: How a humble French engineering term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In Harvey, P., Jensen, C.B., and Morita, A. (Eds.), *Infrastructur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A companion* (pp. 27-39). Abingdon: Routledge.
- Cresswell, T. (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王志弘、徐苔玲譯)。新北：群學。(原書出版於 2004 年)
- Delaney, D. (2017)《領域》(王志弘、李延輝、徐苔玲譯)。新北：群學。(原書出版於 2005 年)
- Kaika, M. (2005). *City of Flows: Modernity, nature, and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 Klinenberg, E. (2021)《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運用「社會性基礎設施」扭轉公民社會的失溫與淡漠》(吳煒聲譯)。台北：臉譜。(原書出版於 2018 年)
-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 Lefebvre, H.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 Low, S. (2017). *Spatializing culture: The ethnography of space and place*. New York: Routledge.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 Lynch, K. (2014)《城市的意象》(胡家璇譯)。台北：遠流。(原書出版於 1960 年)
- Matthewman, S. (2023)《技術與社會理論》(王志弘、高郁婷譯)。新北：群學。(原書出版於 2011 年)
- Nolte, A. (2016).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City*, 20(3), 441-454.
- Rivlin, L. G. (2006). Found spaces: Freedom of choice in public life. In K. A. Franck & Q. Stevens (Eds.), *Loose space: Possibility and diversity in urban life* (pp. 38-53). Routledge.
- Stone, D. (2007)《政策弔詭：政治決策的藝術》(朱道凱譯)。新北：群學。(原書出版於 2011 年)
- Tuan, Y. F. (1998)《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潘桂成譯)。國立編譯館。(原書出版於 1977 年)
- Tuan, Y. F. (2018)《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出版於 1974 年)
- Urry, J. & Larsen, J. (2016)《觀光客的凝視 3.0》(黃宛瑜譯)。台北：書林。(原書出版於 2012 年)
- Winner, L. (2004)〈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方俊育、林崇熙譯)。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STS 讀本：科技渴望社會》。新北：群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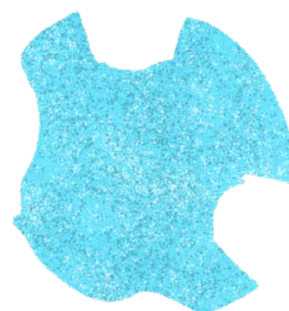
## 附錄：全台大專校院校湖形體



中興中興湖



高雄大東湖



台北大心湖



成大成功湖



師大人工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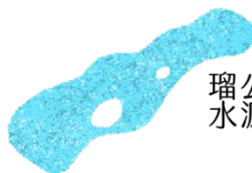


政大景觀湖

臺大



醉月湖



瑠公圳  
水源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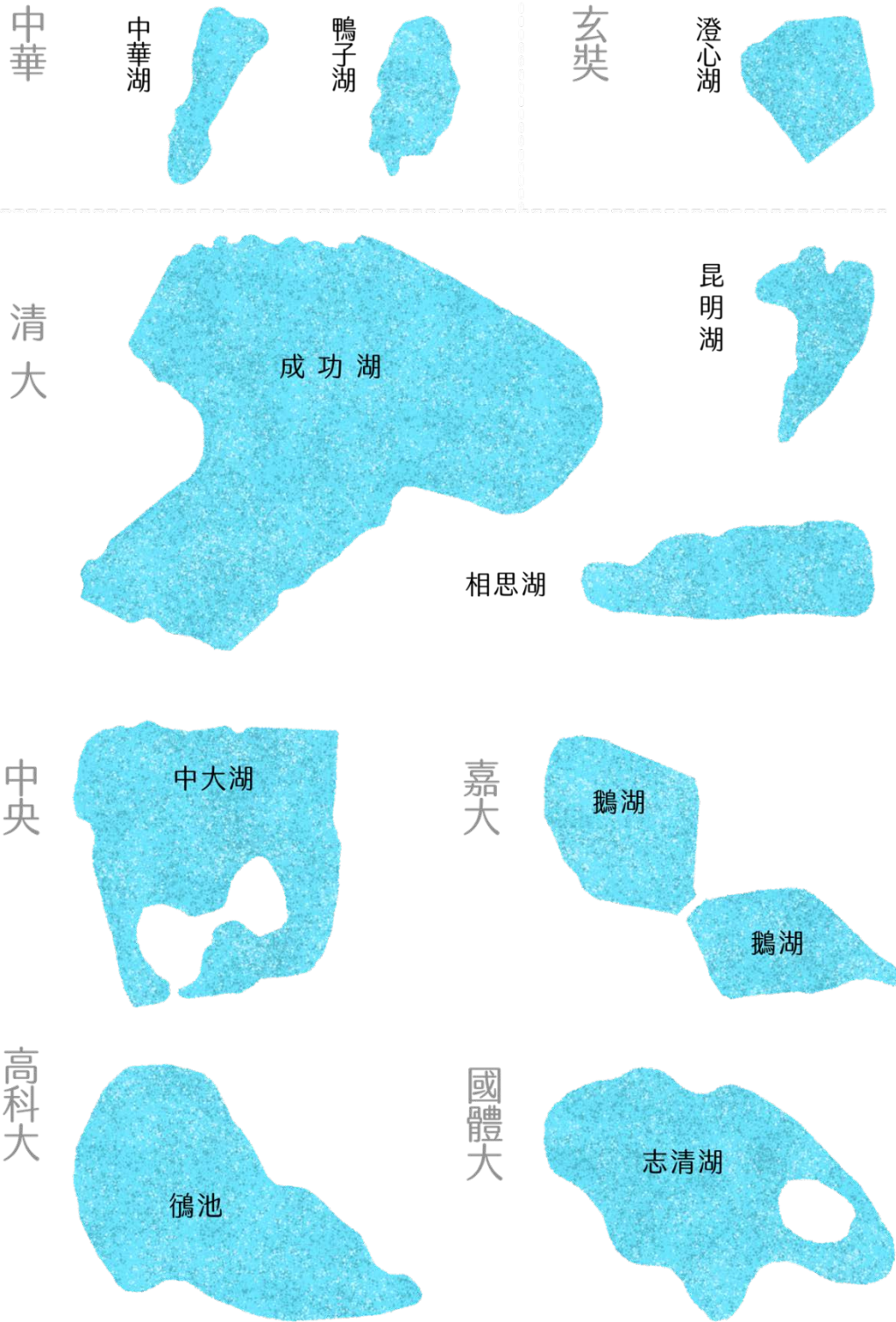
交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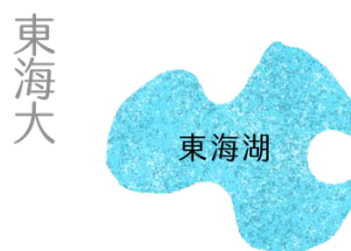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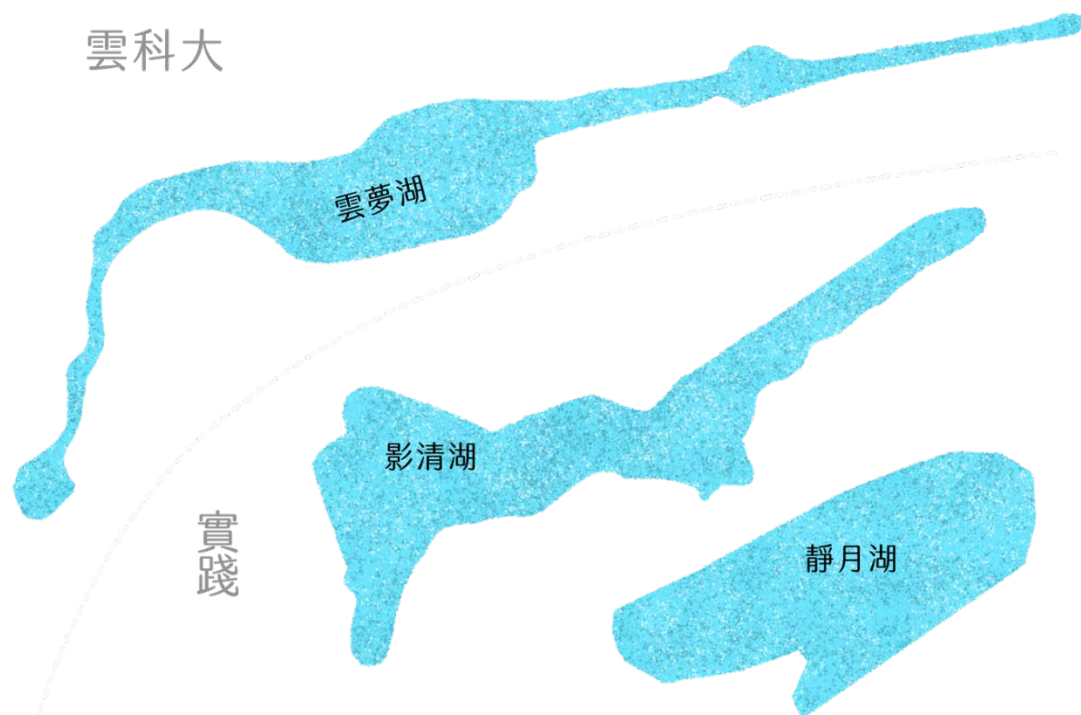


竹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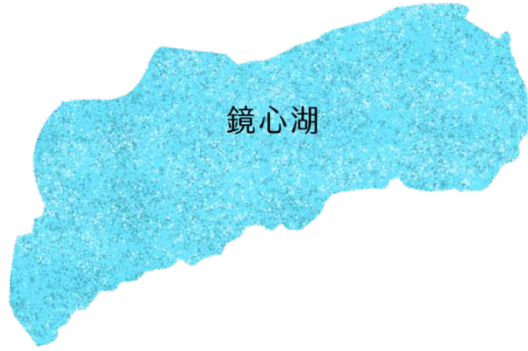
西區  
滯洪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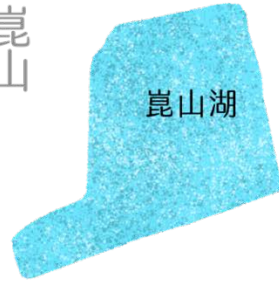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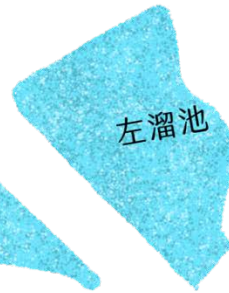
台東大



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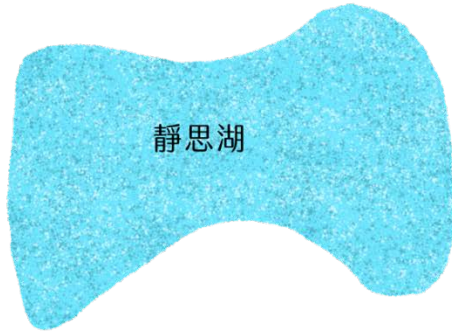
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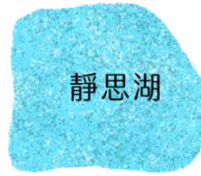
靜思湖



靜思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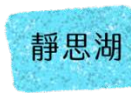


靜思湖



屏科大

靜思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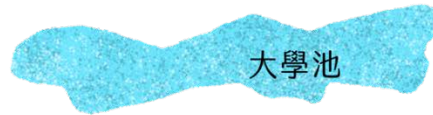
映霞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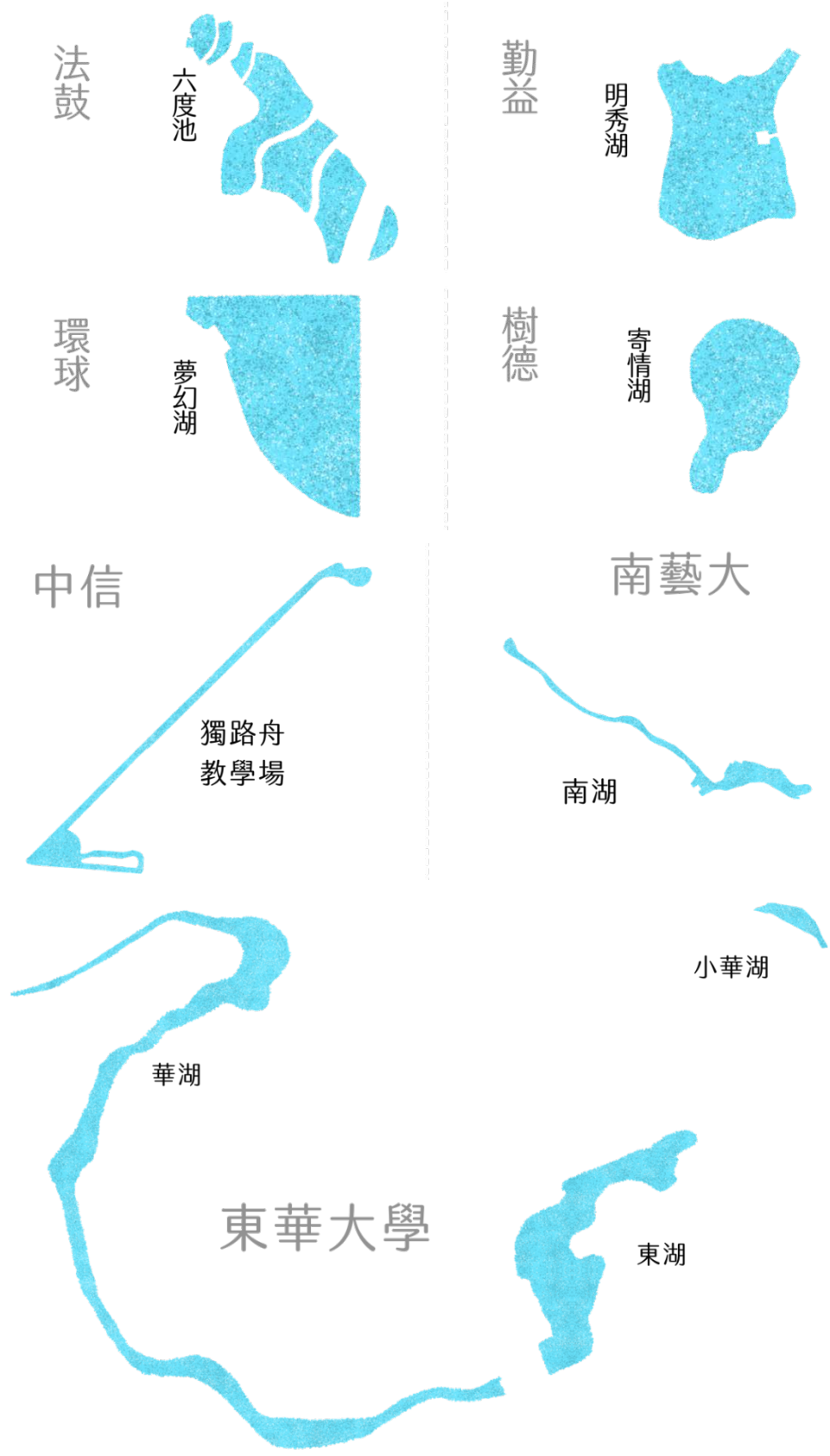


南華



金大





# Exploring Campus Lake: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s of Artificial Lakes i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ampus

*Kai-Jie, Yang\* & Yan-Jie, Chen\*\**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rtificial lakes, referred to as "campus lakes," in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ploring thei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In contrast to typical water facilities, campus lakes stand out with their conspicuous visibility and emphasis on aesthetic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campus lakes, employing the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artifacts to analyz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ers' "power" and users' "rights." It also examines the role of campus lakes in local social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rough field observations at five representative sites, the study delineates the phenomenon's contours, delving into processes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boundary shifts, and fluctuations. It elucidates the images and symbolic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creating a sense of place. Ultimately, the paper underscore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campus lakes are intertwined, serving as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supporting their operation with material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im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campus lakes,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and unresolved mysteries within the research topic.

**Keyword: Campus lakes, infrastructure, territory, place, campus planning**

---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jay70707@nycu.edu.tw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yjchen9508@gmail.com